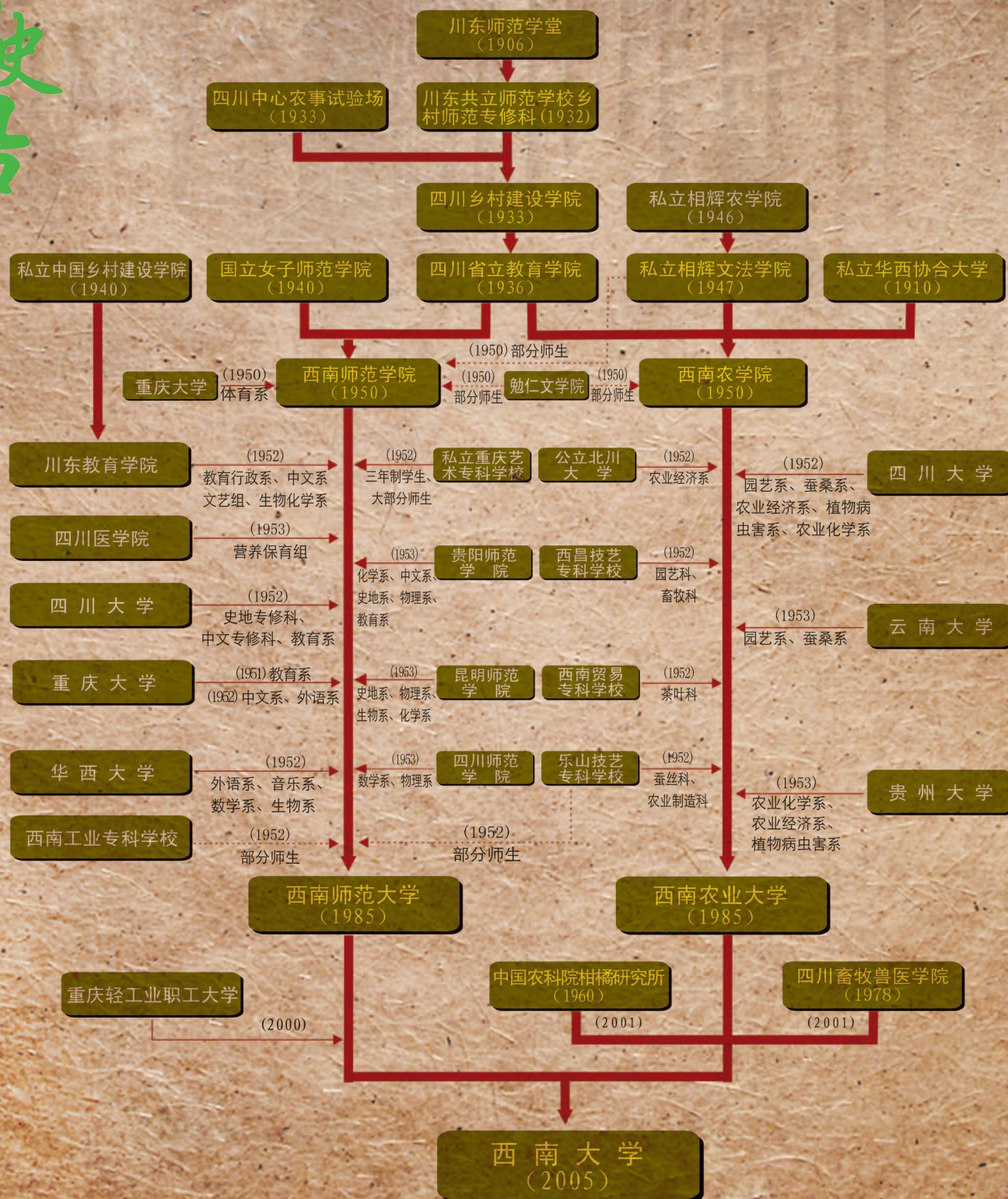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 西南大学记忆

## 名师风采

宝剑锋从磨砺出——记孙培良教授



## 档案拾遗

西南师范学院1952-1953年院系调整概况

##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二）

——记卢作孚对创建相辉学院的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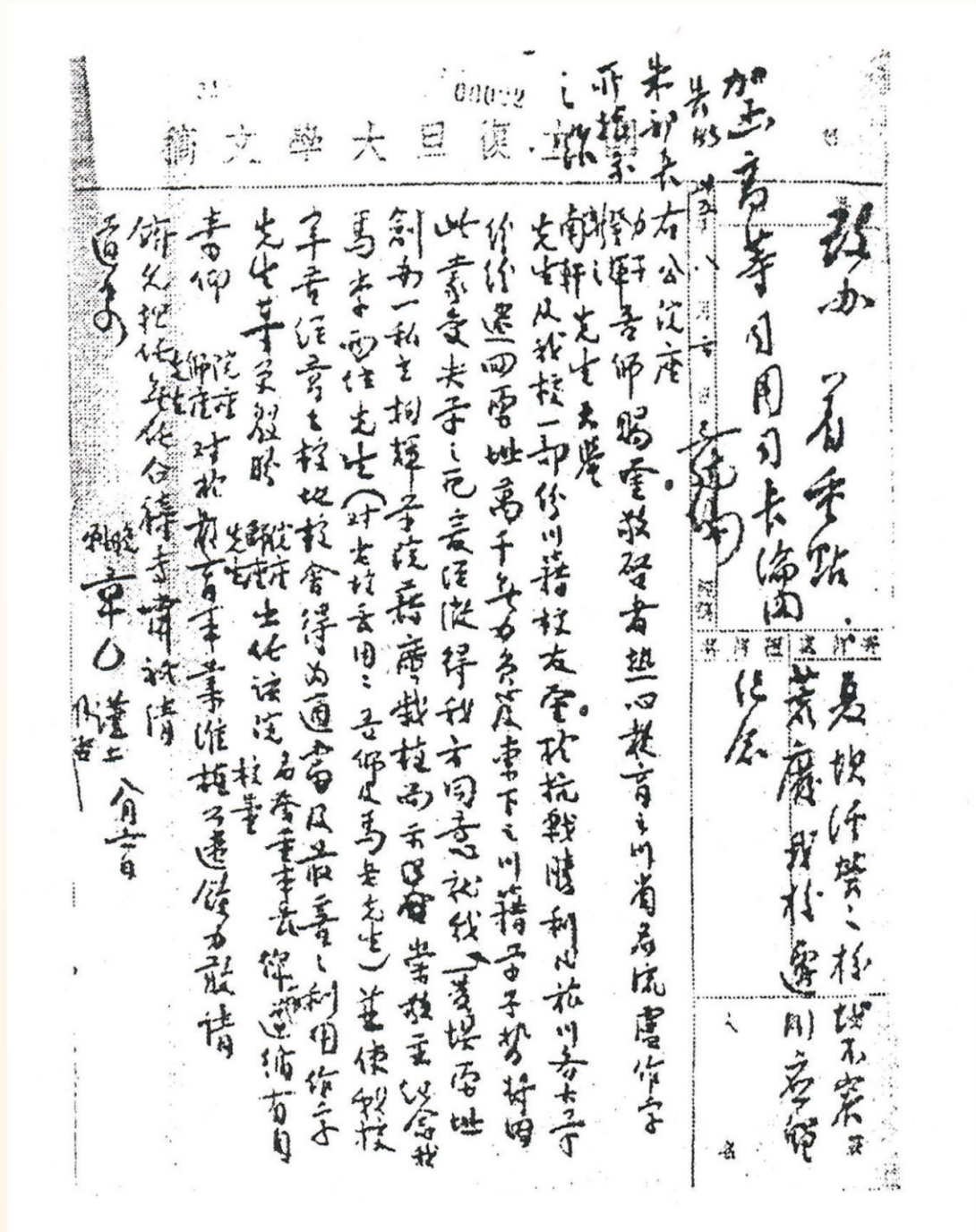
## 校史论坛

校史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主办：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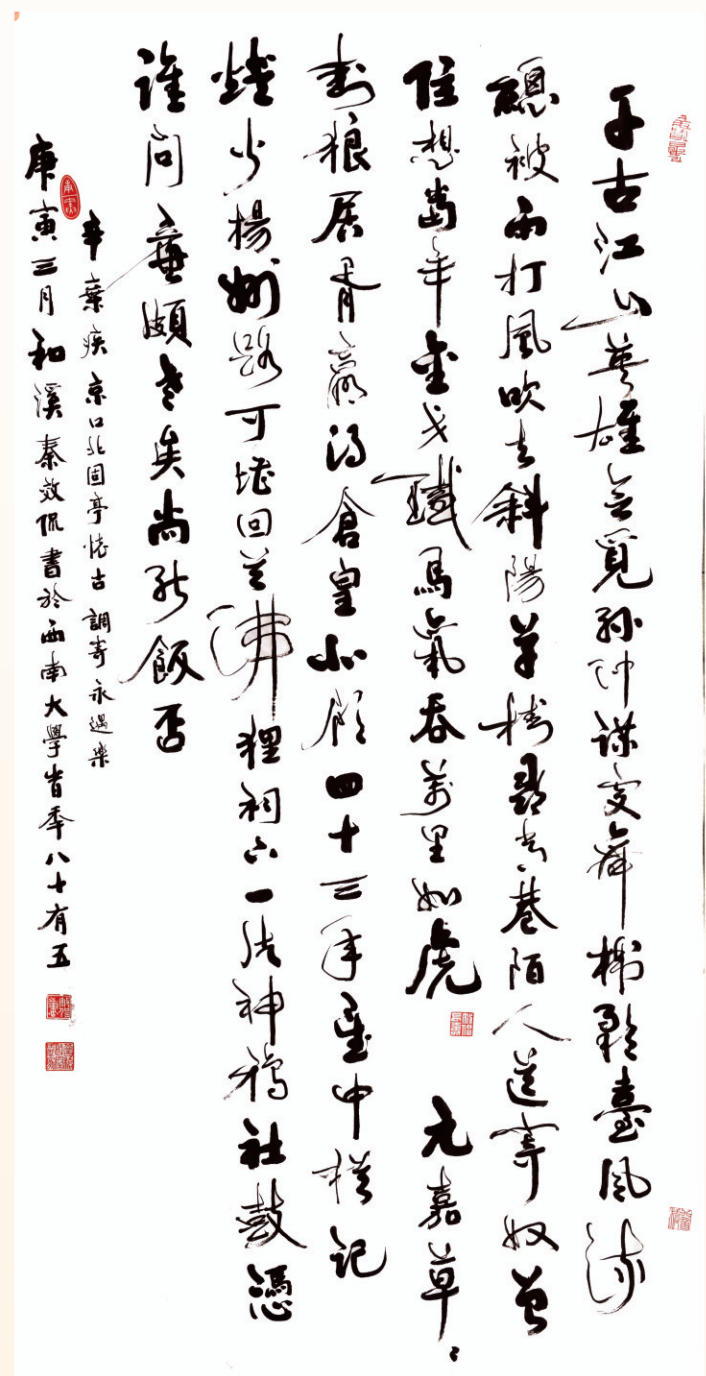
2013年第3期  
(总第20期)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章益校长为创办相辉学院事致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吴南轩函<sup>1</sup>

<sup>1</sup>本图片由刘重来提供。



秦效侃<sup>1</sup>书法作品<sup>2</sup>

<sup>1</sup>秦效侃，1925年生，四川省岳池县人。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书协常务理事、重庆市诗词学会顾问。其书以行、篆见长，在其60岁以后多以行书应世，间亦作甲文、金文、隶书。主要著作有《未花集》《北音桥运甃诗文稿》等。

<sup>2</sup>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ZH12-2。

# 刊首语

□文/张晓华

昨晚下了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早上起来的时候,地上还能够看到水渍,一股自然的风迎面而来,有一种雨后的清凉感觉。

好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过了太久,慢慢地,就被时间沉淀了。就像一场雨,雨过天晴后也就干了,时间久了,便没有了痕迹。某一天突然想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记住的东西好少,一个名字,一事物,或者一个地名,或者只是一点模糊的印象,甚至全都淡忘了。

时间总是能够沉淀下琐事的灰尘,过滤掉那些微小的瞬间。一切留恋的、不留恋的都会沉淀在时光的流年里。幸好,我们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昨日的种种欢笑与泪水,以及对生活的一些思考,以便在岁月流逝人事更迭后还能捕捉往昔的记忆。



# 西南大学记忆

2013年第3期(总第20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李明 靳玉乐  
李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编：吴江

执行主编：张晓华

责任编辑：张晓华

编委：郭兰 杨程程 刘润

编辑：肖艳 蔡安庆 马静  
熊晓汶 李天兰 颜永友

美编：刘润

## 校训：



#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 名师风采

4 宝剑锋从磨砺出——记孙培良教授 ..... 杨程程

## 档案拾遗

7 西南师范学院 1952-1953 年院系调整概况 ... 张晓华

## 校史校情

13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二)

——记卢作孚对创建相辉学院的重大贡献 ..... 刘重来

18 求学寻道知无尽 扬帆力排千重浪

——父亲朱世禔留在沙磁区和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一段记忆

..... 渝敏 渝慧 渝平 渝生

21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 封期平

25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发展历程 ..... 张晓华

29 与曾勉所长在一起的日子 ..... 李兆麟

30 北碚行 ..... 申再望

31 解放前后的相辉学院

——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碚和护校漫记 ... 李华模

36 办公大楼遭围起了 ..... 杜缙华

# 录

38 西师岁月随想录 ..... 李玉光

40 刘达耕诗歌选 ..... 刘达耕

## 校友天地

41 悉心求索 学而有成(下)

——记西南大学校友申再望 ..... 点点

## 影像记忆

46 下放劳动 ..... 张晓华

## 西大掌故

51 袁隆平的三个“差一点” ..... 邓力

## 校史论坛

53 校史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 张艾利

封面人物 孙培良

封二 章益校长为创办相辉学院事致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

之、吴南轩函

封三 秦效侃书法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0107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073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 宝剑锋从磨砺出——记孙培良教授

□文/杨程程



孙培良<sup>1</sup>

## 艰苦的求学之路

孙培良,生于1910年12月8日,原籍河北省武强县古坛村。孙培良幼年生活困难,因祖父早死,又正值荒年,孙培良的父亲和两位叔父一起逃荒在外。两位叔父逃到东北沈阳,父亲逃到北京,和母亲织绦为生,孙培良便出生于北京。

六岁时,孙培良入初小读书,因为家中贫困,中途失学一年。父亲想要孙培良辍学在家帮助织绦补贴家用,而母亲则希望他能继续读书,最后孙培良还是得以升学。但因为家境实在艰难,不允许孙培良只读书而不劳动,所以每天放学后,孙培良都要在家中干活,不仅要纺线到深夜,有时还要带着织好的带子到天桥等市场的杂货摊上去卖。

1922年,孙培良正读高小。就在这一年的暑假,

小学由七年制改为六年制。孙培良所在的班级共30多人,有20多人毕了业,包括孙培良在内的其余10多人,被校长拒绝发放毕业证,原因是他们成绩差,达不到毕业标准。但实际上不予毕业的人当中也有成绩优秀的,只因为都是穷人子弟,衣履破旧,平时就遭校长白眼,毕业时更是被有意刁难。而孙培良天生傲气,不堪受辱,干脆自行退学,之后失学一年。那时,孙父感到织带子已经难以维持一家生活,而孙培良也不得不开始找工作贴补家用。经同乡介绍,孙培良到保定一个私人开的精神治疗病院当工友。做了3个月,孙培良抑制不住想要继续读书的强烈愿望,便返回北京,并考取了北京崇文门外营房第二十六小学高小二年级的插班生。

1925年高小毕业后,孙培良打算继续升学,可父亲并不愿意再供他上学,孙培良便报考了公费的北平国立师范学校。那一年报考北平国立师范学校的人有800多名,最终只录取了40人,孙培良也在其中。父亲拗不过他,只好让他继续读书。到了学校孙培良才发现,虽然师范学校是公费——不收学费,免费供给膳食,但是在第一学期入学时,仍需要交保证金、制服费等。另外,学校还指定要买白布麻毡和盥漱用具等生活必需品,总共要用20多元钱。父亲只好东借西凑,又亏本卖了些带子,才勉强凑齐了保证金和制服费。至于床毡和用具之类,只好买些次品充数。父亲的这次借债,使得家里的负担愈加沉重。而师范学校一读就是六年,其间孙培良又不能帮助赚钱养家,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已无法维持。孙培良入学之后,父母就带着两个弟弟返回武强县。孙培良的祖母在那里生活,有几亩地,一家五口靠种地勉强维持生活。

<sup>1</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SW0608-009。

## 十年漂泊,扎根西南

师范学校毕业后,孙培良没有马上就业,最初的一两年都是靠借贷生活,每天只去北平图书馆看书、学习。他一心想在大学找工作,或者在上海出版界做翻译,但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只好靠在北平的报纸《北晨学园》上投稿挣点稿费。当时投稿费一般是每千字三元,孙培良却只能拿到一半,一个月能得稿费20多元,仍不足以维持生活。1933年,北平国语执行委员会附属机关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招考编纂员,孙培良报考成功,但因为并非大学毕业,只得半薪,每月25元。但迫于生活,他只得接受,而且在此工作上做就是4年。后经人介绍,他到私立华北大学艺术教育系任教。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孙培良被迫离开北平,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活。

1937年10月4日,身上只有十几元钱的孙培良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几天后,买船票到山东烟台,又转青岛,从青岛到济南,再到南京。半路就已身无分文的他幸好得到同行人的接济才能勉强不挨饿。到了南京以后,孙培良以大学讲师的身份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询问是否有工作机会,但只得到了一张去往武汉的船票。由于武汉没有熟人,他再次转道长沙,投奔曾经的《北晨学园》编辑瞿冰杰,却投奔未果,差点落到流落街头的境地。万般无奈之下,孙培良参加了由国民党78军成立的军官培训团,结果不到一个月,培训团也解散了。正当穷困无告之际,孙培良在长沙街头偶遇了在北平国立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张雪门。他正要到广西桂林筹办广西省幼稚师范学校。孙培良便随他一同前往桂林。到了桂林2个多月,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再加上也不是兴趣所在,1938年3月,孙培良便又回到长沙。此次回长沙,是与曾经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同事周达夫共住。回到长沙不久,看到报纸上武汉招考部派广东省中学国语教师,两人便报考并成功被录取,于是到了广东。但不久,日本侵略者进犯广东,孙培良只好又逃往内地。他先到达广西梧州,与梧州县政府文教科接洽后得到到桂平的船票,后又转桂林,搭乘便车到达重庆。1939年3月,他持过去的工作证件,与当地教

育部说明情况后,被派到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算暂时安定下来。

1941年,编译馆迁到北碚,机构扩大,增设了翻译委员会,孙培良便在此担任副编审职务。但因与编译馆的总负责人梁实秋先生不合而被辞退。1944年9月,孙培良到重庆市立师范学校教国文。在校期间,在任校长严重贪污腐败,甚至克扣学生伙食,引起在校学生的强烈不满。孙培良因坚决支持学生们的反抗活动,从而引起了教育局的注意,因此在下一年聘约到期后便被赶出了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培良受原北平的同事魏建功的邀请,一同赴台湾,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1946年1月,孙培良一行3人到达台湾,他在担任国语推行委员常务委员的同时,兼任台大教授,教授中国通史。同年秋,孙培良与被任命为台南工学院院长之王石安一同去接收学院。除了要承担英语课程之外,他还要帮忙处理学院的事物性工作。直到学院工作上了轨道,孙培良又被调回台湾省编译馆工作。编译馆的馆长为许寿棠,是鲁迅先生的好友,因思想进步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所以在1947年5月,编译馆便被迫关闭了。孙培良再次失业。至此,他不得不返回大陆,寻找工作机会。

孙培良从台湾返回大陆,首先到达上海,又转道南京。是年冬,应邀前往兰州大学任教,教授西洋史。1949年春天,到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做西洋史教授,直至重庆解放。女子师范学院在1951年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孙培良转任史地系主任。孙培良自此到达了自已事业的最后一站,在这所学校里完成了他所有科研教学工作,直至退休。

## 矢志学术,史学专家

孙培良一生矢志学术,即使颠沛之间也不曾放弃。

解放前,孙培良的学术活动遍及文、史、哲等众多领域。他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书时,广泛阅读当时流行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毕业后在北平图书馆读书的两年里,他致力于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著作。在《北晨学园》上他发表过多篇哲

## 名师风采

学论文、译文和《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表》。在北平编译馆时,参与翻译了《苏联新文化》,并独立翻译了《现代逻辑引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整理过辽、金、元三代的社会史料,担任了部分两汉社会史的整理工作。甚至还曾前往西安调查秦腔剧种,写有《赴陕调查秦腔报告》,论述了秦腔的起源、发展、流布情况,以及与京、汉、川剧等剧中的关系,但因为缺乏支持,此项工作没有进行下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孙培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1956年编著本科讲义《世界中世纪史》,1963年写成函授教材《世界中世纪史》和《学习指导书》。他编写的教材着重补充了国际研究薄弱的亚洲各国史的内容,还编译了西欧各国的王朝世系表。1960-1962年,他写作了《印度奴隶制社会的形成》和《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印度社会》。1966年写有《论清宫》。十年动乱期间,孙培良的研究工作一度中断。但在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他就发表了论文《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图的几件银器和铜器》。

七八十年代,孙培良学术研究涉及了中西交通史,中亚、西亚史,但重点集中于伊朗古代史。1978年,孙培良出席中国社科院在天津召开的社科规划会议,并表示愿意承担编写伊朗史的任务,返校后即着手写作。这期间,他还为《外国历史名人传》撰写了居鲁士、大流士和摩尼的传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伊朗古代中世纪史的16个条目,并审阅校订伊朗史全部词条;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译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历史词条。同时,他每年都



工作中的孙培良<sup>2</sup>

<sup>2</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2.0079。

<sup>3</sup> 孙培良.萨珊朝伊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萨珊朝伊朗史<sup>3</sup>

有论文发表面世,有时一年多达2、3篇,诸如《丝绸之路概述》《摩尼教及其东西传播》《中世纪的巴格达》《关于马兹达克运动》《摩尼和摩尼教》《袄教杂记》《中国画法的西渐和伊朗细画》《〈山海经〉拾证》《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萨珊朝伊朗述略》等一系列高质量论文。其中,《关于马兹达克运动》一文获得198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一文荣获了1986年四川省历史学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全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孙培良的最后十年已然重病缠身,曾多次入院治疗,但即使在住院期间,他也没有放弃伊朗史的研究。1984年春,他完成了《萨珊朝伊朗史》的初稿,但出于“晚年著述,尤应慎重”的考虑,他并没有急于将此书出版,而是几度推敲、反复修改,使得此书在他去世前仍没能出版。直到1995年此书才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发行。

1987年11月4日19时50分,孙培良因患慢支伴感染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6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孙培良教授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的穷苦青年成长为一个学术大家的一生。(下转第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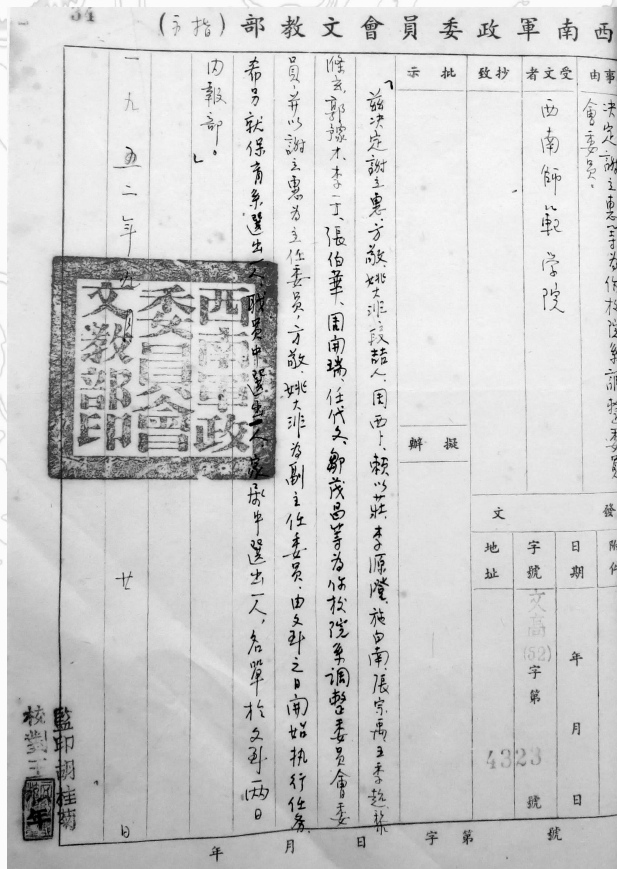


# 西南师范学院 1952—1953 年院系调整概况

□文/张晓华

**编者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仿照苏联的教育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将中国一举纳入苏联教育模式。从1952年开始，我国各高校仿照苏联教育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此次调整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以1952年规模最大，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西南师范学院按照“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的实施，奠定了西南师范学院新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1.1952年9月西南师范学院成立了院系调整委员会，谢立惠担任主任委员，姚大非、方敬为副主任委员。



关于谢立惠等为西南师范学院院系调整委员会委员的批复<sup>1</sup>

<sup>1</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2-XZ11-15。

2.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西南师范学院在院系调整过程中, 迁往北碚原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及川东区党委的驻地。从 1952 年 10 月 10 日开始, 西南师范学院正式在北碚新校址办学。

西 南 师 范 学 院 稿 66

送 達 機 關		新華日報廣	
別 文		主	
註 備			
事由		由 分 派 人 送 去	
主任委員	生活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總務長	教務長
文書組主任		書	
擬 稿		黎 軍	
重慶新華日報北碚廣告部		生 子	
本院奉令遷移北碚, 茲送上遷校啟事稿一份, 請自十月九日起刊登三天, 務希準時登出為荷。		黎 軍	
檔 目:		蓋 簽 核 會	
發 文 節 錄 (幼) 字 第		年 二 五 九 一	
收 文 字 第		十 月 七 日 十 一 時 擬 稿	
2690		十 月 七 日 十 一 時 核 簽	
號		十 月 七 日 十 一 時 封 發	
號		十 月 七 日 十 一 時 封 發	

(192×272)1951.5000

请新华日报社刊登迁校启事的函<sup>2</sup>

<sup>2</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01-1952-XZ11-15。

3.按照西南地区院系调整的规划,西南师范学院是重点发展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其他人员都是调进不调出。在院系调整中,并入西南师范学院的系科有:四川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修科、中文专修科、史地专修科;重庆大学中文系、外语系;华西大学数学系、生物系、外语系、音乐系;川东教育学院(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育行政系、中文系文艺组、生物化学系及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和乐山技艺专科学校部分师生。

**TELEGRAPH OFFIC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由 FROM	流水號數 RUNNING NO.	報類 CLASS	發報局名 OFFICE FROM	來報號數 TELEGRAM NO.
chg	276	S	chg 重慶	276
時刻 TIME	原號數 ORIGINAL NO.	字數 WORDS	日期 DATE	時刻 TIME
400		75	17	251
值機員 BY	備註 Service Instructions:			派送員 BY
3/17				

6007西 0589南 6788院 Peking 北碚

6148調 0354入 0132你 > 6799校 5074者 6850重 1987慶 1129大 1331學 6007西  
 0589南 1562工 1413專 6788西 9918+110520動 6500身 1557川 2639東 > 403教  
 7108院 6788西 9925+11205767至 9926+110520動 6500身 0355內 1331學 3932生  
 3948男 < 8 > 0086人 1166女 < 63 > 0086人 0934回 1557川 1129大 1331學  
 6788西 9926+110520動 9927+110520動 6500身 0355內 1331學 3932生 3948男  
 < 97 > 0086人 1166女 < 127 > 0086人 5478華 6007西 1129大 1331學 6788西  
 9928+110520動 9929+110520動 6500身 6007西 0589南 2429文 > 403教 6788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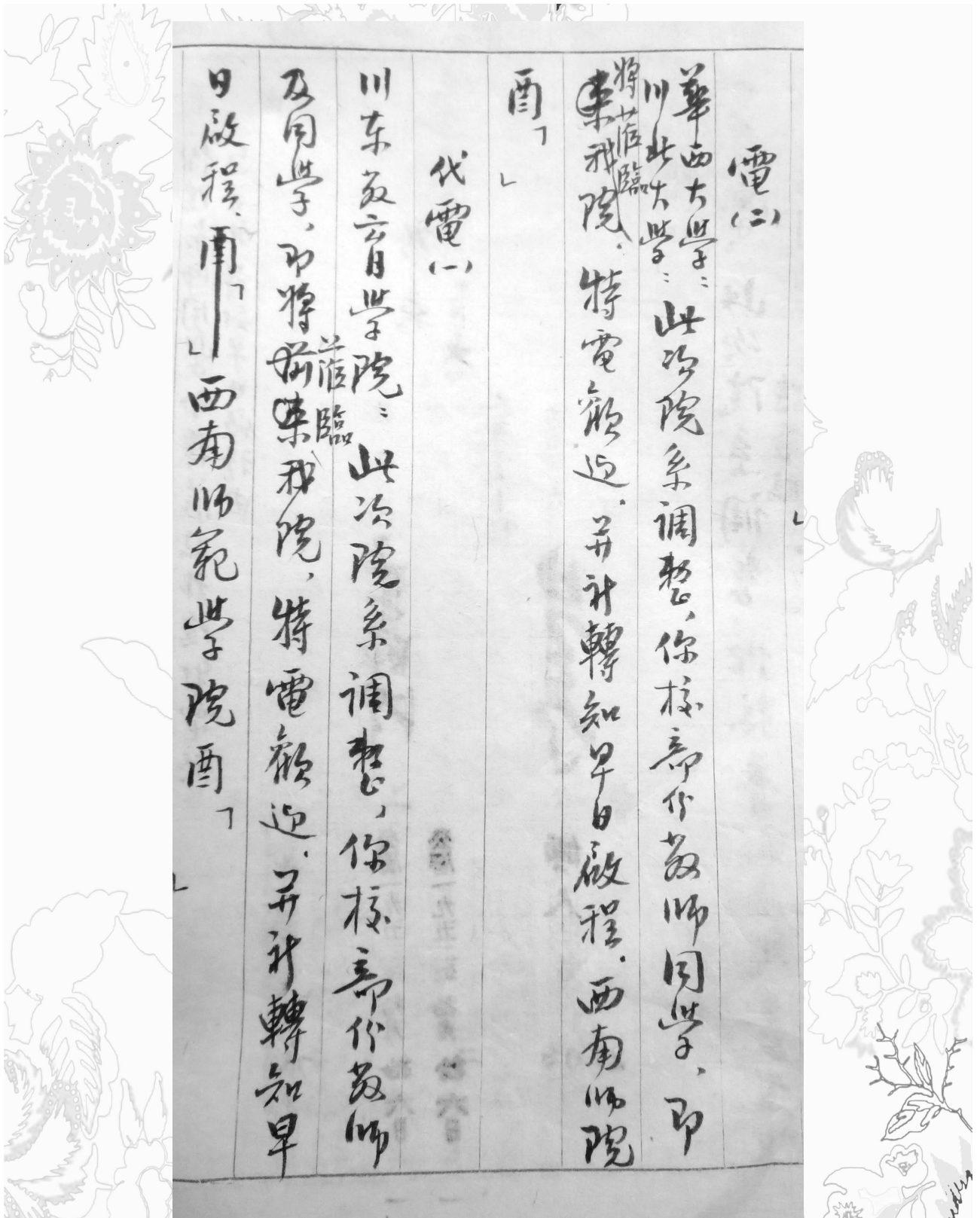
107

12 10 17

注意: 如有查詢事項請帶此紙  
 Note: Any enquiry respecting this telegram, please produce this form.

重庆大学等校学生定期来西南师范学院的电报<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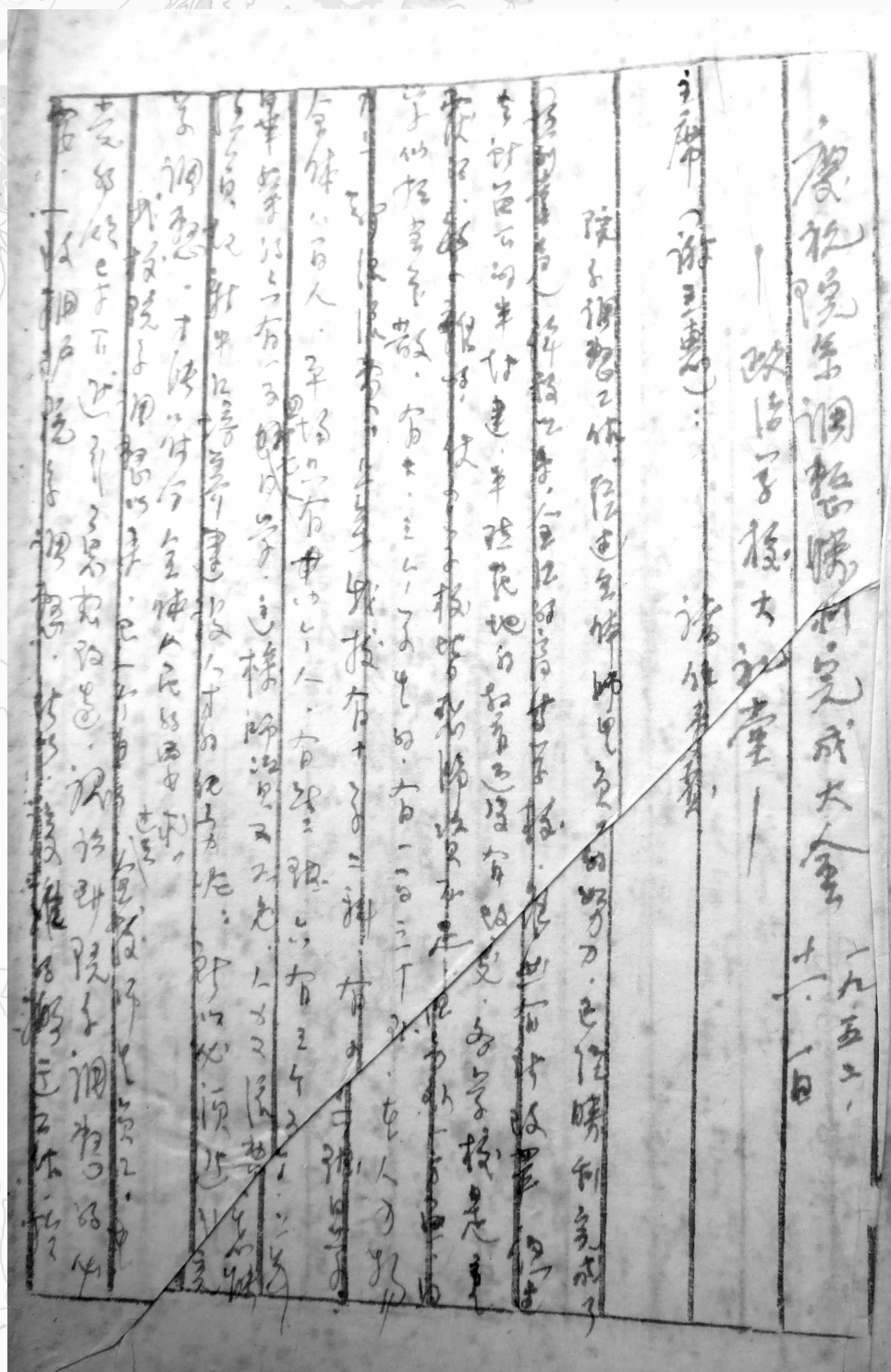
<sup>3</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2-XZ11-15。



欢迎华西大学等校师生来西南师范学院的电(代电)<sup>4</sup>

<sup>4</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2-XZ11-15。

4.1952年11月1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了庆祝院系调整和迁校胜利大会。这次大会是学院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起点。



庆祝院系调整胜利完成的大会讲话记录<sup>5</sup>

<sup>5</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2-XZ11-16。

5.1953年,西南地区高等师范院校再次进行系科班级调整。在此次调整中,四川师范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贵阳师范学院的教育系、中文系、史地系、物理系、化学系,昆明师范学院的史地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华西大学的营养保育系保育组共200多名师生调整至西南师范学院。在系科班级调整的同时,学院的系科设置也进行了调整,共设有教育系、学前教育系、中文系、俄语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音乐系和图画制图系等十二个系和教育专修科、中文专修科、史地专修科、数学专修科、生物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图书馆博物馆专修科和保育专修科等八个专修科,学院的系科专业设置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备。

✓ 4. 西南師範學院：史地專修科分設為歷史、地理兩專修科。

三、班次合併

1. 貴陽師範學院：史地系歷史組三、四年級，地理組一、二、三、四、五年級，理化系物理組三年級及中國語文系二年級併入昆明師範學院。成都藝專一年級師範生併入藝術科。

2. 昆明師範學院：史地系地理組二、三、四年級，歷史組二、三、四年級，數學系二年級、理化系物理組二、三、四年級，化學組二年級及生物系全體學生（二年級19人、三年級21人）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3. 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二年級、物理系三年級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三、班次合併

1. 貴陽師範學院：史地系歷史組三年級3人，地理組一年級20人、三年級6人；理化系物理組一年級9人、三年級3人及化學組一年級16人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2. 昆明師範學院：史地系地理組二年級7人、三年級3人，歷史組二年級9人、三年級11人；數學系二年級10人；理化系物理組二年級3人、三年級4人，化學組二年級10人及生物系全體學生（二年級19人、三年級21人）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3. 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二年級6人，物理系三年級4人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 1. 貴陽師範學院：史地系歷史組三、四年級，地理組一、二、三、四、五年級，理化系物理組三年級及中國語文系二年級併入昆明師範學院。

2. 昆明師範學院：史地系地理組二、三、四年級，歷史組二、三、四年級，數學系二年級、理化系物理組二、三、四年級，化學組二年級及生物系全體學生（二年級19人、三年級21人）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3. 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二年級、物理系三年級併入西南師範學院。

西南地区高等师范学校系科班级调整方案<sup>6</sup>

经过院系调整,全院师生员工达2200多人,其中教职员工已达500多人,增加了三分之一,学生有1670余人,增加了一倍多。西南师范学院成为全国高等学校里系科最多、规模最大的学校之一。

(编辑 郭兰)

<sup>6</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3-XZ11-19。

#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二)

## ——记卢作孚对创建相辉学院的重大贡献

□文/刘重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从上海迁到重庆北碚下坝(以后复旦大学陈望道教授更名为夏坝)8年的复旦大学又要返迁上海原址。面对复旦大学遗留下来的即将荒废的校址校舍,以卢作孚为首的一些热衷于教育的有识之士于1946年7月倡议在复旦大学旧址创办了一所大学——私立相辉学院。学院设农艺、文史、外文、经济、银行会计5系,以后又增加了法律系,1947年10月又改校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学校规模不大,却有吴宓、方敬、金企渊、张默生等知名教授在此校任教。解放前夕,学生曾达1880人,教职员工130多人,有占地面积200多亩的农场和15亩地的运动场<sup>1</sup>。

1950年9月,西南文教部决定在相辉学院校址



卢作孚<sup>2</sup>

成立西南农学院,将相辉学院的农艺系及其农业专修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和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农艺系合并成立西南农学院。与此同时,相辉学院其他系科的教师转入西南师范学院。2005年,西南农业大学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成西南大学。可以说,相辉学院是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所以,要论西南大学百年校史,相辉学院无疑是其中重要篇章。

然而在创建相辉学院的有识人士中,最有贡献的人无疑是卢作孚。是他首先提出利用复旦大学返沪后的旧址建一所大学的倡议;是他以相辉学院筹建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亲自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书,要求批准成立相辉学院及有关学院的学科设置、人事、财务的安排意见;是他主动邀约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等社会贤达鼎力支持此事;是他在相辉学院首届董事会上被推选为首任董事长(由于卢作孚当时工作实在太忙,所以婉辞未就任董事长,只答应担任董事,后由于右任为首任董事长<sup>3</sup>)。

幸运的是,在当年筹建相辉学院的档案中,清楚记载了卢作孚为筹建相辉学院的热心活动和重大作为。可以说,卢作孚是创建相辉学院的第一人。因此,说起西南大学百年校史,就不能忘了卢作孚。

### 一、在川渝和峡区办大学,是卢作孚多年心愿

卢作孚热心筹建相辉学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虽然以办实业闻名于世,但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当过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师,曾以“教育

<sup>1</sup> 重庆市北碚区志[M].重庆: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419。

<sup>2</sup> 图片来源:[http://cathay.ce.cn/person/200912/14/t20091214\\_20609728.shtml](http://cathay.ce.cn/person/200912/14/t20091214_20609728.shtml)。

<sup>3</sup> 张守广.卢作孚年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384。

救国”为已任,积极投身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1921年他在泸州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期间,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主持了新教育改革试验,开展了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运动。1924年他又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把成都地区的民众文化教育搞得丰富多彩、红红火火。他写过不少有关教育的论著,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改革、教育普及、民众教育都有不少精辟独到见解。以后他虽投身于“实业救国”,创办民生公司,发展民族航运事业,并开展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但他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在民生公司,他积极推行职工教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他除了大办正规学校外,还倡办民众教育,办了船夫学校、力夫学校、妇女学校、挨户学校(挨家挨户上门进行扫盲教育)、场期学校(农民赶场时开办的学校),使峡区教育盛极一时,远近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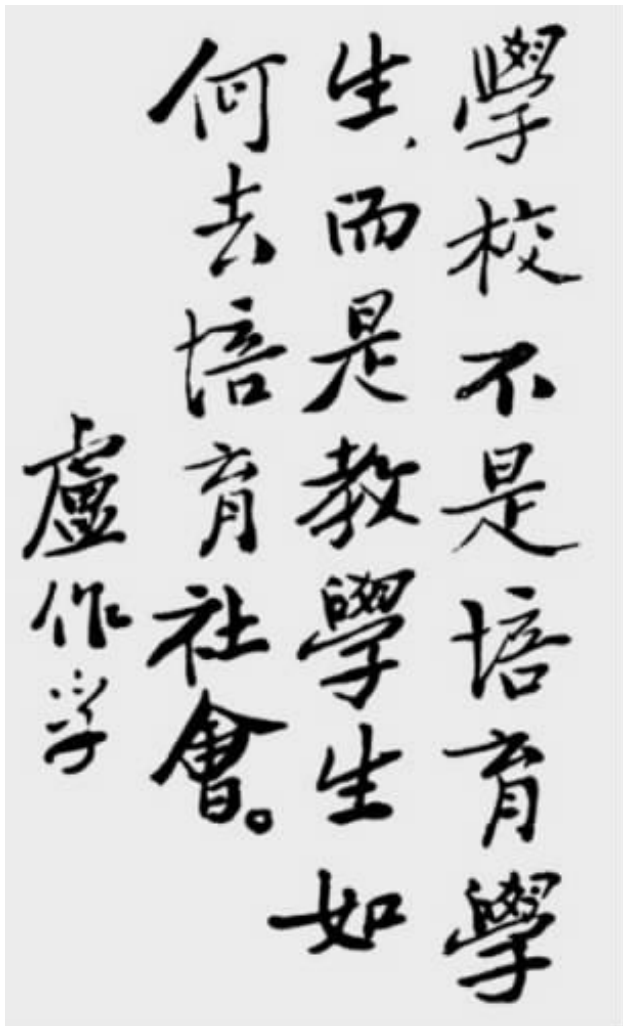
卢作孚一生都重视教育,一生都热爱教育。1948年,他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家了,但他仍认为自己是个办教育的。他说:

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sup>4</sup>。

特别要指出的是,卢作孚热切盼望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在当时交通极不便利的川、渝和嘉陵江三峡地区办大学。早在1924年,他在帮助四川省政当局拟订整顿机关工作的办法纲要《四川的新生命》中就提出,要在四川“扩充大学校,使足应中学毕业生更造学问之需要”<sup>5</sup>。

1930年他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一文中,对学校教育,他希望省政当局考虑“应如何筹划四川办若干大学,在哪一地方办哪几科。期于这几个大学能够领导四川研究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sup>6</sup>。最能难能可贵的是,1934年他在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

拟订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中,更明确提出要在峡区创办“完全的大学校”<sup>7</sup>。而这一愿望,竟因抗战爆发,沦陷区高校迁渝而不期然实现了。



卢作孚先生遗墨<sup>8</sup>

抗战爆发后,重庆定名陪都,成了大后方的中心,也成了沦陷区高等学校迁移的集中区。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市区及其周围和万县市,集中了全国各省市的高等学校57余所,可谓盛况空前。”<sup>9</sup>而小小的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在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热情欢迎和真诚帮助下,有十余所高校包括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国立

<sup>4</sup> 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R].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40。

<sup>5</sup> 卢作孚.四川的新生命[R].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2。

<sup>6</sup> 卢作孚.四川人的大梦其醒[R].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5。

<sup>7</sup> 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R].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60。

<sup>8</sup> 图片来源:[http://news.xhby.net/system/2013/04/11/016867074\\_02.html](http://news.xhby.net/system/2013/04/11/016867074_02.html)。

<sup>9</sup> 李定开.重庆教育史(2)[M].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2006.586。



戏剧专科学校等迁到峡区继续兴学。特别是随校迁来的一大批教育文化名人,如陈望道、胡风、张志让、洪深、章靳以、周谷城、卢于道、曹禺、方令儒、老舍、梁实秋、萧乾、萧红、邓广铭、孙寒冰、方令儒、梁宗岱、蒋碧微等。这些高校和文化名人的到来,使北碚的文化教育空前繁荣活跃起来。更幸运的是,川渝的中学毕业生,也有了就近上大学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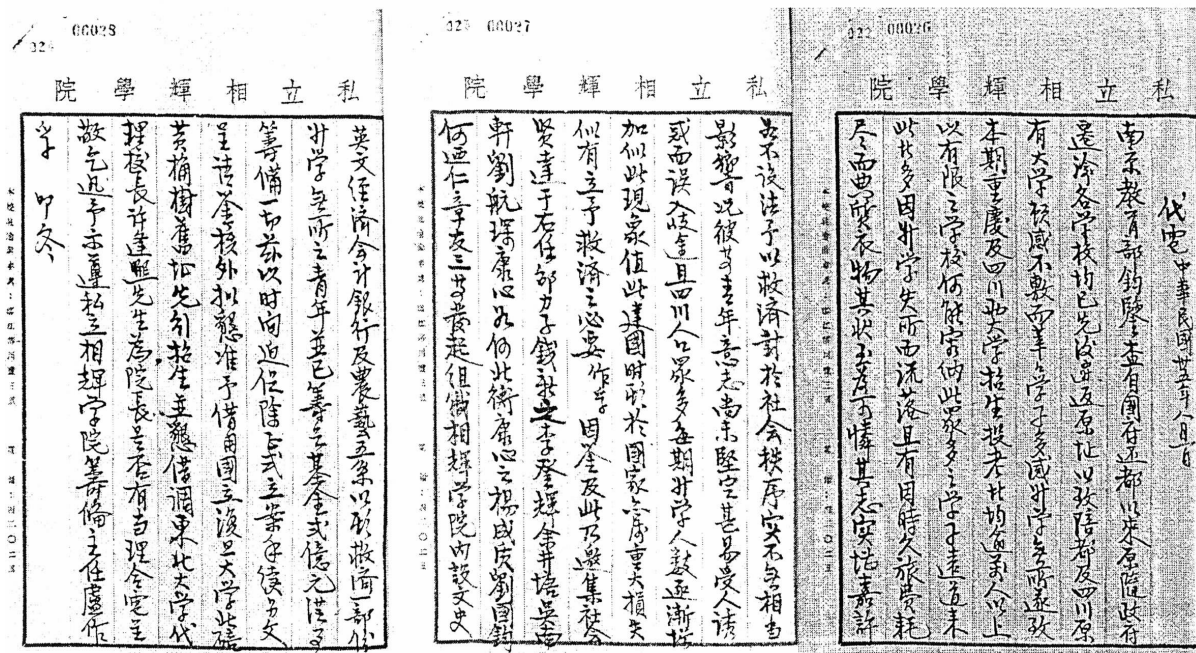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这些从沦陷区迁来的高校又要纷纷迁回原地。“据统计,在抗战期间由外地先后迁重庆的40多所高等学校在抗战胜利后都迁回了原址。”<sup>10</sup>这本是一件大好事,但对川渝地区的高等教育,这么多高校的离开,则出现了“大滑坡”现象,“重庆的高等教育又几乎滑坡到了抗战前的水平”<sup>11</sup>。特别是大量川渝中学毕业生面临无就近读大学的可能性,而到外地读大学却苦无路费。还有不少正在这些内迁大学读书的川渝学生因无路费也难以随校返迁原址读书。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到外地读书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所需路费甚巨,不要说那些贫困学生无法凑足路费,就是复旦大学的老师也为随校返迁的路费发愁。不少教师因“还乡旅费无着,纷纷

拍卖书籍衣物。著名学者陈望道每逢赶场日期,亦将书籍衣物携往街头摆地摊拍卖,情景极为辛酸”<sup>12</sup>。著名教授尚且如此,贫穷学生去外地读大学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而更严重的是,由于内迁高校迁离川渝,致使本地原有的几所大学无法承受突然增加的报考学生就读重担。据统计,1946年夏,仅报考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的考生就各达万人以上,而这两所大学当时每年能容纳的学生最多不过几百人。这样一来,就必然会使大量中学毕业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另外,当时这些内迁高校在抗战8年中已聘用了不少川渝籍教职员工,他们或因家眷子女问题,或因经济问题,或因乡土关系不愿随校迁移,但留下来却又无校可留,无书可教,生计事业顿时成了大问题。

而对于卢作孚来说,原打算在峡区办几所大学的愿望随着这些高校返迁而成了泡影。正因为如此,以卢作孚为首的热心教育的人士提出:何不利用这些返迁高校留下的校址校舍和不易搬迁的教学、实验设备另办一所大学,来解决上述问题呢?



卢作孚为成立相辉学院事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sup>13</sup>

<sup>10</sup> 李定开.重庆教育史(2)[M].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2006.578.

<sup>11</sup> 李定开.重庆教育史(2)[M].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2006.586.

<sup>12</sup> 许有成.复旦大学北碚时期大事年表初稿.北碚志资料,1985,(5).

<sup>13</sup> 本图片由作者提供。

## 二、创建相辉学院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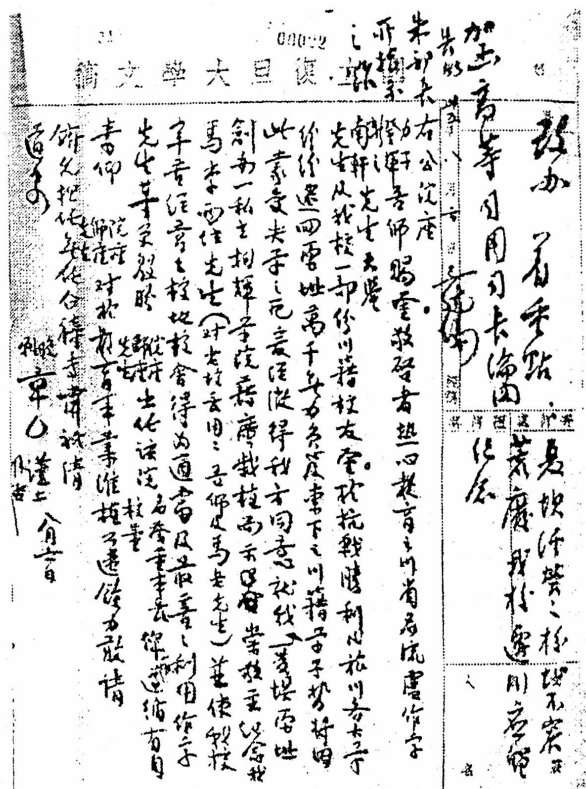
关于卢作孚创建相辉学院的重大贡献，我们从尘封已久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一是发现了1946年8月1日卢作孚以私立相辉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名义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封电函原件，原文如下：

“南京教育部钧鉴：

查自国府还都以来，原随政府迁渝各学校均已先后迁返原址，以致陪都及四川原有大学顿感不敷，而莘莘学子多感升学无所，遂致本期重庆及四川两大学招生投考者均逾万人以上。以有限之学校何能容纳此众多之学子？远道来此者多因升学失所而流落，且有因时久旅费耗尽而典质衣物，其状至为可怜，其志实堪嘉许。如不设法予以救济，对于社会秩序实不无相当影响。况彼等青年，意志尚未坚定，甚易受人诱惑而误入歧途。且四川人口众多，每期升学人数逐渐增加，似此现象，值此建国时期于国家亦属重大损失，似有立予救济之必要。作孚因鉴及此，乃邀集社会贤达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李登辉、余井塘、吴南轩、刘航琛、康心如、何北衡、康心之、杨成质、刘国钧、何迺仁、章友三等发起组织相辉学院，内设文史、英文、经济、会计银行及农艺五系，以期救济一部分升学无所之青年，并已筹之基金贰亿元从事筹备一切。兹以时间迫促，除正式立案，手续另文呈请签核外，拟恳准予借用国立复旦大学北碚黄桷树旧址先行招生，并恳借调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许逢熙先生为院长。是否有当，理合电呈敬乞迅予示遵。

私立相辉学院筹备主任卢作孚叩冬。”

从卢作孚这封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电函中可以看出：一是卢作孚首先倡议在复旦大学返迁后在其校址建立相辉学院；二是他主动邀约在社会上有极高声望，又和复旦大学关系密切的社会贤达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等人“发起组织相辉学院”；三是卢作孚申诉了迁渝高校返迁后川渝地区高等教育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陪都及四川原有大学顿感不敷，而莘莘学子多感升学无所”，甚至发生考生典当衣物、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以恳切之辞申诉了



章益校长为创办相辉学院事致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吴南轩函<sup>14</sup>

创办相辉学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四是告之所拟定相辉学院所设系科、资金筹备情况；五是“恳准予借用国立复旦大学北碚黄桷树旧址先行招生”；六是“恳借调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许逢熙先生”为相辉学院院长，主持院务。卢作孚的这封函电不长，但言简意赅，内容丰富，考虑周密。由此函可以证明，创建相辉学院，是卢作孚一手策划的。

但相辉学院要利用的是复旦大学遗留下来的校址校舍，自然必须得到复旦大学同意才行，特别是要得到与复旦大学关系密切的社会贤达的鼎力支持才行。复旦大学非常支持卢作孚这一倡议，1946年8月6日，即卢作孚电函国民政府教育部5天后，由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先生出头，给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吴南轩等社会贤达写了一封信，这些人，有的是他的老师，有的曾是当时的高官，有的与复旦大学关系密切，所以章益校长特别写了此信，请他们支持卢作孚创办相辉学院的倡议，并恳请他们出任相辉学院名誉董事长及董事职务。此信节录如下：

<sup>14</sup> 本图片由作者提供。

热心教育之川省名流卢作孚先生及我校一部分川籍校友鉴于抗战胜利，凡旅川各大学纷纷迁回原址，万千无力负笈东下之川籍学生势将因此蒙受失学之厄。爰经征得我方同意，就我夏坝原址创办一私立相辉学院，籍广栽植而示崇敬，并纪念我马、李两位先生（指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李登辉两先生——笔者），并使我校辛苦经营之校地校舍得为适当及最善之利用。作孚先生等更殷盼（院座、师座、先生）出任该院名誉董事长、董事……

从章益校长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卢作孚是一位“热心教育之川省名流”。他认为卢作孚倡议创办相辉学院，起码有三大好处：一是可以使“万千无力负笈东下之川籍学生”免受“失学之厄”；二是将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李登辉的名字定为新建大学校名，是对复旦大学最好的纪念；三是可以使复旦大学“辛苦经营之校址校舍得为适当及最善之利用”。出于对卢作孚的信任，章益校长才以复旦大学校长的名义在此信中明确表态：一是同意在复旦大学遗留的校址校舍创办相辉学院，二是同意卢作孚之请，邀约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吴南轩等社会贤达出任相辉学院名誉董事长和董事，以支持卢作孚这一壮举；三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老校长李登辉，也为了延续复旦大学的办学精神，决定从马、李二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定校名为“相辉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此信是写在“国立复旦大学文稿”上，右下侧有批示：“夏坝经营之校址，不容荒废，我校迁川应留纪念。”从批示口气看，显然是章益校长的批示。这一批示非常有远见。由于夏坝复旦大学校址校舍被相辉学院继续利用，后又为西南农学院

接用。在辗转利用中，一些校舍得以保存。如今，这里已成为“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旧址”（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题名），成为重庆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著名旅游景点。

卢作孚对峡区高等教育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是一贯的。他除了对晏阳初来北碚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外<sup>15</sup>，还对梁漱溟在北碚创建勉仁文学院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1987年，梁漱溟在重病中，仍念念不忘此事。他说：

“1941年我将创办不久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1946年尾，我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便在这景色宜人的北碚息影长达三年之久，静心从事著述。《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写于此时。1948年我又与一般朋友创办勉仁文学院于北温泉，从事讲学活动，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来北京，才离开北碚。在上述我在北碚从事的种种活动中，自然都得到作孚先生及其胞弟子英先生的热心支持与帮助。”<sup>16</sup>

卢作孚在为其乡村建设规划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蓝图中，有建立“完全的大学校”的目标，这是他的一个梦想。当年，他帮助在峡区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相辉学院、勉仁文学院可以说不遗余力。如今，在峡区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校——西南大学。筚路蓝缕，薪火绵延，西南大学百年办学历程中，多少仁人志士为其献策出力。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有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卢作孚。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

（编辑 张晓华）

<sup>15</sup> 见刘重来、周鸣鸣.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一）——记卢作孚对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重大贡献[J].西南大学记忆,2012,(4)。

<sup>16</sup> 梁漱溟.怀念卢作孚先生.[J].名人传记,1988,(5)。

# 求学寻道知无尽 扬帆力排千重浪

## ——父亲朱世禔留在沙磁区<sup>1</sup>和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一段记忆

□文/渝敏 渝慧 渝平 渝生

山川毓秀,松柏长春。

今年是家父朱世禔诞辰100周年。日前,接到沙坪坝区党史研究室电话,要我们提供并撰写父亲当年在沙磁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有关材料和文章,以充实和完善沙磁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抗日救国和解放斗争所作的历史功绩。一曲衷肠今犹在,我们相聚嘉陵江畔宁静阁,反复寻觅相关史料,走访有关人士,深情撰写此短文,追忆父亲多彩而不平凡的人生。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也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父亲朱世禔,字佛艇,山东曹县人。1914年出生在山东省曹县东北十五里朱袁楼村一个大地主的家庭里。当父亲尚未出生时,爷爷已经病故。父亲是遗腹子,无兄弟姐妹,奶奶何思霞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儿子身上,终生守寡,含辛茹苦地把父亲抚养成才。

父亲从小在家读私塾,念古文、写毛笔字,1928年冬才就读曹县高小。1929年高小毕业后考入菏泽县山东省立第6中学。在中学阶段,他读了一些鲁迅先生的作品,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深受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以及张资平等浪漫主义和颓废派的影响。

1935年夏,父亲考入青岛山东大学文学院国文

系,由舅爷何思源<sup>2</sup>供给学费和生活费。1935年冬,父亲入学不久就在山东大学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赵太侔<sup>3</sup>的学生运动。同时参加了一个有抗日救亡思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山大新文学会”,阅读和研究进步文学,学习鲁迅翻译的艺术论和高尔基、柏林斯基以及鲁迅的作品,练习写作散文和小说等,并在青岛《国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他们曾聘请山东大学教授台静农<sup>4</sup>、周学普<sup>5</sup>、颜实甫<sup>6</sup>等具有民主抗日思想的教授作指导老师。当时参加活动的同学有:徐中玉<sup>7</sup>、蔡天心、狄庆楼、陶绍武、丁靖宇、吴绩、沈仪吉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或优秀教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山东沦陷,学校被迫停课。父亲和山东大学流亡的同学一起由齐鲁大地奔波至四川万县。1938年3月,父亲随山东大学合并到刚从南京迁来沙坪坝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在各自所学专业,继续完成学业。

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祖国和人民灾难深重,父辈们是见证者、亲历者。而父亲也以满腔爱国热情,投身抗日救国洪流中!

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父亲参加了当时由沈钧儒出面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

<sup>1</sup> 重庆区划,抗战时期为重要文化区和工业区。

<sup>2</sup> 何思源,1896—1982,山东菏泽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28年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44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

<sup>3</sup> 赵太侔,1889—1968,戏剧教育家,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

<sup>4</sup> 台静农,1903—1990,安徽霍邱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1946年去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sup>5</sup> 周学普,浙江嵊县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1946年赴台,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

<sup>6</sup> 颜实甫,1898—1974,重庆江津人,早年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年调任四川大学教授。

<sup>7</sup> 徐中玉,教育家、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五届作协主席。

他和同学徐中玉、张健<sup>8</sup>、杨贤铭<sup>9</sup>等人发起组织中大学会。该学会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的地下党员有石山<sup>10</sup>、周毅华、黄文澍、丁靖宇等。中大文学会的活动很多,曾经邀请郭沫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洪深(第三厅话剧团负责人,原山东大学教授)、胡风等人作报告。除不定期举行的座谈会和报告会外,还通过墙报宣传抗日救国。

父亲在中央大学国文系读书时,非常活跃,要求进步。1939年4月,由石山介绍,父亲写了自传,由组织批准后,在中大文学会、中苏问题研究会和社会问题研究会联合办公室,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陈元晖<sup>11</sup>任监誓。为了便于工作,当时在党内叫鲁方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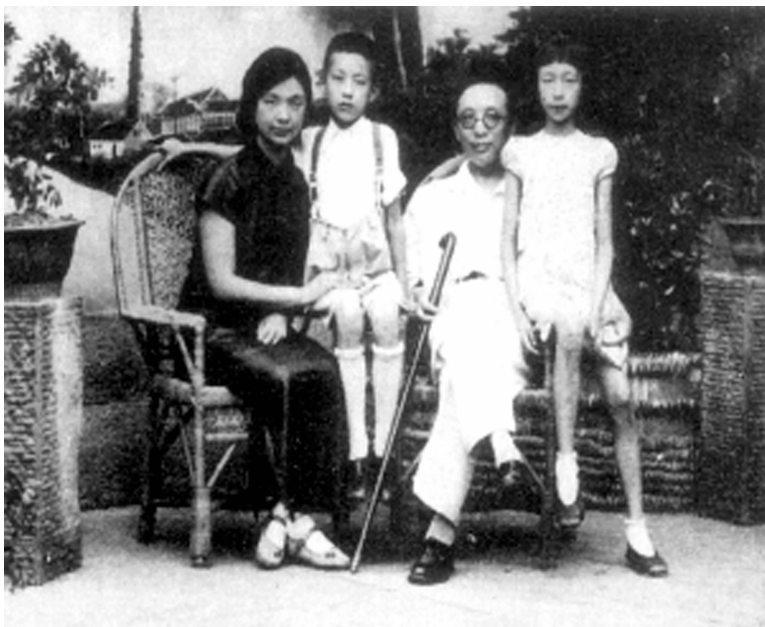
父亲入党后,由石山带领新党员参加党小组生活,组长杨静,同小组的有刘毓泉、申惠文,他们是属于中大新支部,由石山直接领导。除同小组党员外,他们只知道石山是代表支部领导,不允许和其他党员发生组织关系。当时石山告诉大家:“旧支部由于交通人员警惕性不高,被国民党宪兵抓去,暴露了全部党员名单,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另成立新支部,你们这个小组由我直接联系,大家要提高警惕,努力工作,不允许和其他党员发生任何横的联系。”

1940年春,父亲由石山介绍到沙磁区委支部工作,任组织委员,支书是沙贻瀛,宣传委员是方和璧<sup>12</sup>。上级领导人是孙少礼<sup>13</sup>。

1940年8月,父亲中大毕业(本应该1939年毕生,因山大合并到中大,缺一学期成绩,全体同学多读一年),由中央大学教务长童冠贤<sup>14</sup>介绍到沙坪坝南开中学教国文。父亲到南开中学教书后不久,组织又调他到沙磁区特支工作,负责组织工作。当时的支书是曹自明<sup>15</sup>,上级领导人有莫止<sup>16</sup>、张仲明<sup>17</sup>。

1941年1月底,因社会工作变动,父亲到重庆巴县东温泉复旦中学教书,和学生党员李忠禄一起工作,组织关系也由莫止转至复旦中学。当时的上级领导人是刘文彬<sup>18</sup>。1941年9月,父亲又回到南开中学,作教务处教学股长,他在南开中学先后工作了5年半,与刘兆吉<sup>19</sup>一起共事,交往甚密,为同乡挚友。

1946年8月,父亲应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简称



抗日战争初期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及子女摄于重庆北沙<sup>20</sup>

<sup>8</sup> 张健,曾任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

<sup>9</sup> 杨贤铭,1939年去陕北延安。

<sup>10</sup> 石山,原名靳吉甫,解放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sup>11</sup> 陈元晖,心理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sup>12</sup> 方和璧,后改名何均,曾在北京市委工作。

<sup>13</sup> 孙少礼,解放后在外交部,后到外交学院工作。

<sup>14</sup> 童冠贤,1894—1981,早年留学日本、美国、英国,研究政治及经济学,曾任中大法学院院长。

<sup>15</sup> 曹自明,重大无线电专业毕业,当时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工作。

<sup>16</sup> 莫止,又名李建章,解放后在上海工作。

<sup>17</sup> 张仲明,曾任渝州大学校长。

<sup>18</sup> 刘文彬,又名刘国定、刘国治,1949年重庆挺进报被敌人破坏后被捕。后因叛党,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sup>19</sup> 刘兆吉,1913—2001,著名心理学家,曾任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sup>20</sup> 图片来源: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10-04/11/content\\_45408.htm](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10-04/11/content_45408.htm)。

## 校史校情

女师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新任院长劳君展<sup>21</sup>教授盛情邀请,到女师院(位于现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老校区)任总务长兼国文系副教授,全面协助劳君展接手女师院各项工作。父亲在女师院任教期间,与宗真甫<sup>22</sup>(时任教务长,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商承祚(时任国文系主任,解放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授)等教授积极支持和参加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亦用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并多次粉碎国民党特务在女师院抓捕进步师生的阴谋。

1947年夏天,重庆高校发生“六·二”大逮捕事件。那次女师院被特务抓捕的学生约30余人,教务长宗真甫也被带走了。此时,劳君展院长正在南京教育部开会,父亲和留校学生立即组织营救被捕同学后援会,并召开大会,提出强烈抗议,妥善开展工作。由于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加之学生强烈抗议,社会进步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谴责,国民党特务又找不到学生任何罪名,被迫通知各院校保释被捕学生。女师院被捕学生中,除汪盛荣因为她父亲是伪长官朱绍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送武汉交她父亲教管,其余学生全部由学校保释,回校继续上课。

1948年2月,劳君展辞去女师院院长职务,到北京九三学社中央工作。此时,父亲与接任劳君展的第三任院长张邦珍在诸多办学观点上意见不和,后被张邦珍解聘离开了女师院。同年8月,由张臻一、宗真甫介绍,父亲在中央工校(解放后院系调整,大部分人员到重庆建工学院)训导处任课外活动组主任兼副教授。

解放后,父亲先后在重庆市女子师范学校、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等校任教,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父亲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加之社会关系复杂,在1958年反右倾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都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先被打成“牛鬼蛇神”,后说他是叛徒、特务。1969年,父亲被关押隔离审查,强制劳动改造两年多,剥夺人生

自由,停发工资,家也被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忧虑成疾。不久后,父亲患上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长期便血,身体虚弱,但他仍带病坚持上讲台授课。时至今日,那一幕幕往事,我们记忆犹新。

1978年夏天,父亲病情加重,被迫住进医院,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出院后不久,父亲又出现食道梗阻问题,刚开始吃药、药片,可不用水都可服以下,之后用水服都感觉到不畅通,进而饮食也困难。不久在西南医院和重庆医学院被确诊为晚期食道癌。然而,作为山东汉子,面对绝症、面对生死,父亲坦然淡定,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整个食道被癌细胞全部阻塞,滴水不进,为了延长生命,最后做胃造瘘手术。父亲与病魔进行了顽强抗争,其间痛苦、磨难,常人难以想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勇于面对病痛,不断给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写信,笑谈人生,畅叙友情。记得他在给老同学徐中玉,孙少礼回信时,还乐观调侃:“吾是晚期食道癌患者,已经一年有余,早就不能从口中进食了,人间美食无从品尝,现在水路不通,只能走旱路了。”字里行间,胸襟豁达,高风似竹。

我们清楚的记得,1981年6月初,父亲看书读报、谈吐如故。大脑一直清醒,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不久病情恶化,癌细胞全面转移至膀胱,阻塞尿道,在实施导尿术过程中,钢针触击输尿管前端癌变病灶(约有鸡蛋大小),疼痛难忍。术后半天,人就失去知觉,昏迷不醒。6月28日,医院两次下达病危通知。31日深夜,经全力抢救无效,父亲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和憧憬,怀着对祖国教育事业的一片深情,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工作认真、严于律己、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虽然一生经历坎坷,饱尝磨难,可他仍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工作。他忧国忧民,面对困难、挫折、打击,勇于担当;他两袖清风,诚实做人,快乐干事。为人做事正直一生树美德,教书育人亮节高风万古存——这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下转 56 页)

<sup>21</sup> 劳君展,科学家、早年就读法国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专攻数学、后师从居里夫人攻读放射性物理,并在居里夫人镭放射研究所工作,成为其亲密助手。1927年回国,在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任教。

<sup>22</sup> 宗真甫,曾留学法国,1924年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文/封期平

2013年1月13日，我的父亲——西南大学植保学院教授封昌远因“社区获得型肺炎”引起的多器官衰竭，走完了他不平凡的百年人生路。清明祭祀，父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一幕幕往事清晰如昨，使我夜不能眠，浮想联翩。父亲生前最爱唱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故试填一首满江红，以慰父亲在天之灵。

## 满江红·悼父亲

人生百年，风雨中，闲庭信步。为救国，北平求学，文理兼蓄；12·9学潮风浪急，生死度外冲在前。烽烟起，奔赴成渝鄂，唤民众。

新纪元，捐财产，殚虫灾，保军粮。站三尺讲台，广育英才。硕果累累遭谗言，自身难保慰同仁。中暗箭，血溅教学楼，不低头。

## 被打成“右派”

我的童年，本来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可不知从哪天起，村子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他们手中拿着一些花花绿绿的纸，在大路两旁的房子的山墙上张贴。我们一群刚从幼儿园放学的孩子，由于不识字，也不知那上面写的什么，只是觉得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站在那里看热闹，正在这时，小学生放学了。我和好朋友董美华立刻找来他的小哥哥，问他：“这些花花绿绿的纸上写的什么呀？”他一边看，一边说：“那些花花绿绿的狭长条的叫标语，这些大张的白纸黑字的是大字报。”他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踮起脚，指着标语上的字，一字一顿地大声地念到：“打倒大右派某某某”。他又对我们说，大字报上写的就是他的罪

行。我们又让他念，他说：“今晚要在他家门口开斗争会，你们自己去听。”晚上，邻居家门口果然来了一群人，他们大声叫着这家主人的名字。起先，被叫的人还要出来与“革命群众”辩论，但马上就被一阵阵口号声压了下去。从那以后，村子里的左邻右舍都一家一家地被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大字报打成了右派。被打成右派的人有的从此消失，有的被斗争得灰溜溜的，有的被公安局用手铐带走……我渐渐地感到无比担忧，深怕哪一天，那花花绿绿的标语上有父亲的名字，晚上会有人上我家来……

从此，我和董美华每天从幼儿园一放学，就在村子的路上边玩边往学校里眺望，只要出现了一群拿着花花绿绿纸的人，我的心就提到了喉咙口，直到董美华的小哥哥放学回来指着标语上的字给我们念了，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我才放心回家。我们在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中一天天地熬着，不知过了多久，渐渐地，那些贴标语的人没有出现了。我们恢复了往日的快乐，幼儿园放学后，我们又开始了从前的游戏：藏猫猫、抓特务、修房子、办家家酒等。但在这些表面的快乐下，我心中还是隐隐地担心着。终于，有一天，这群人又出现了，又在村里贴上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大字报。我和董美华各怀心事地等到她的小哥哥一放学就急忙上去叫他念标语，他像往常一样略显得意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踮起脚、举起手、清了清嗓子，大声地念：“打倒……”他突然不念了，手也停在那里，片刻，他转头望了我一眼，手也顺势放下来。他转身想跑，我和董美华上前拉住他，问：“怎么不念下去了？”其实我心中已有几分明白，但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他是突然想起什么事要去做，他的反常与

那上面写的不相干。但他看了我一眼后说：“这次是你父亲，你父亲是右派，你信不信？”我多么希望他说的是真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说我不相信，可是我却说：“我相信。”

我不记得董美华和他的小哥哥是怎么离开我的，只记得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冷嗖嗖的大路上，往学校方向眺望，等我最熟悉的父亲的身影出现。我要等他回家，我要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我希望他像往常一样将飞奔到他身边的我一把抱起，然后说：“没有的事，是小伙伴吓你的。”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等啊等，终于远远地看到了父亲熟悉的身影从四教学楼（现在的34教学楼）里走出来了。我眼巴巴地望着他走上了学校直通现在的6号门的那条大道，看他走完那条大道快出6号门过公路时，我就飞快地向村口跑去。我每次都是这样计算得很准，当我跑到村口，父亲也正过完公路走到村口，我就一边大叫“父亲”，一边扑向他的怀抱。

可这次，我快跑到村口时却放慢了脚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竟认不出他了，我傻傻地望着这个“陌生人”，心想我怎么会认错人呢？但这个“陌生人”说话了，“怎么不跑了呢？”随着问话，他已来到我身边，声音是那么熟悉，分明就是父亲呀。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也开不了口，因为我知道一开口，眼泪就忍不住往外涌，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流眼泪。我默默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父亲的左手，慢慢地向村子里走去。走了一段路后，我轻轻地说：“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又走了几步，我又忍不住怀着一线希望说：“父亲，他们说你是右派了，是不是真的？”父亲用平静的声音几乎是一字一顿的说：“是真的。”说完他加快了脚步，我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深怕此时会有人来抢走他、斗争他。我们就这样一路走回了家。

回家后，父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把我揽在怀里轻声对我说：“我要离开家一段时间，你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要帮妈妈做事，要懂事，你每天从幼儿园放学时一定要带好妹妹，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天晚上，没有人来闹，好像很平静。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父亲被划为“右派”时已经是1958年，当时反右运动已结束。虽然表面上没有1957年斗争激烈，但惩罚比1957年残酷得多。首先

简化了划定右派的标准，没有大鸣大放，没有辩论，甚至没有按规定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因此，20年后，落实政策、平冤假错案时，学校到市政府去拉回当年的黑材料通知事主去看，看后统一销毁。父亲去看时竟然没有他的黑材料！最后只在人事处找到了几个人捏造的“反党言论”。按当年反右政策规定，高教5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是要将所有材料报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存档的。其处分也是只降3级工资。而1958年“补划右派”则是，只要单位里有几个对你有意见而又与领导关系好的人，搜罗你平时一些“反党”言论，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中一鼓动、散布，就可宣布你是“右派”。从此你就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抹杀了过去的一切功绩，连工资都被停发，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才稍有好转——按家里人口每人每月13元标准发放生活费。文革开始后连这种待遇也停了，后来的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也只补发了文革被扣的生活费。

### 下放劳动

一天晚上，父亲妈妈一起收拾行李，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很小声，我们都听不清。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父亲就背着一个用黄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只有用刷了一层桐油的油布防水）包的铺盖卷，手提一网兜，网兜里装洗脸盆、漱口杯、饭碗等生活用品，匆匆走出家门。我站在在家门口，一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有一封信寄回家，晚上我们一家人就围坐在饭桌旁，静静地听妈妈读父亲的信。父亲信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说他现在是如何的好，好像他去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那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在当时很时髦、很美好的名字——红旗人民公社。（多年后哥哥告诉我，红旗人民公社在沙坪坝高滩岩附近。）他每封信都问家中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几姊妹都一起说：“不需要。”1959年国庆10周年后，最小的妹妹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我想要一个红气球。”我们都心疼妹妹，她还不懂事，国庆节她看到外面的红气球，觉得好看所以想要。妈妈回信时就写了妹妹的要求。过了很久，父亲回信了，我一捏就发现比以前厚些。晚上



一家人又坐在饭桌周围，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打开信封，在展开信纸的一刹那，一个漂亮的红气球掉在饭桌上。我们高兴极了，争着拿过来吹，可是谁也吹不涨它，它比一般的气球大、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等大哥回来再吹，他一定能吹涨。寒假大哥回来了，我们几姊妹都迫不及待地叫他吹气球。他在我们几姊妹的围观下，充满信心地深吸一口气，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吹，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我们都忍不住拍手欢呼起来，大哥也吹得更卖力，突然，砰地一声，漂亮的大气球不见了，只剩下几块红色的气球皮在饭桌上静静地摆着。大哥说：“爆了，这就是物极必反。”

一天晚上我们都准备睡觉了，突然有人敲门，妈妈问是谁，外面竟传来父亲的声音。我赶快跑去开门，父亲背着黄油布包着的铺盖卷，手中提着网兜出现在门口，网兜里装满了又大又红的番茄。父亲进屋后放下铺盖卷，打开网兜将番茄拿出来把饭桌都摆满了，这些番茄不但又红又大，而且表皮都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腻光滑得没有一点疤痕，每个都有父亲的拳头大，而且每个都是红透饱满，一看就知是自然熟透了的。父亲拿一个来轻轻撕下皮，用刀像切西瓜那样切成几块，我们每人拿一块来吃。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番茄，又甜又鲜又翻沙。父亲见我们还想吃，就又剥一个来切开。就这样，他切一个，我们吃一个，一连吃了好几个。他一边切一边说：今天下午才通知我回校，社员们都舍不得我走，一再挽留，最后见实在留不下了，就送来很多蔬菜、水果、鸡蛋等。我要步行10来里路，才能坐车，实在拿不走，只好拿了这些番茄。我们突然发现只是我们在吃，父亲一口也没吃，我们叫他吃，他说：你们吃，我在那里天天都在吃。那天晚上父亲讲了许多他在红旗公社的故事，他从小读书从没干过农活，可是他不但很快学会了一切农活，而且很快社员们发现他干得比谁都好，于是，插秧是他插第一排，因为他插得又直又匀，他插了第一排，社员们以他的为标准跟着插。这样，只要哪块田有他插头排秧，那块田的秧就又匀又直，结果插秧的时候他就负责插每块田的第一排秧。父亲很快在红旗人民公社出了名，到处都来请他去作插秧标兵。社员们播种、点粮食、种菜时也都争着要他去挖头排窝子，然后再随他的线条间距挖窝播种、

点粮食、种菜。哪里出了病虫害，也是他一去就解决。他还为那里的农田水利建设出谋划策，解决了不少难题。所以，他走时公社、生产队都舍不得放他走。那天晚上他说得很高兴，我们都发现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精神愉快，脸色黑里透红，充满朝气，人都年轻了许多。我们全家都被他的精神感染了，跟着他笑，暂时忘记了他走后我们所受的苦——不仅遭人白眼，受人欺负，还因此断了经济来源，只得靠拾煤渣、割牛草、打猪草换点微薄的钱来维持生计。

父亲这次回来后，家庭经济确实有了一点改变。学校按家中人口数量每人每月补助13元，但这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为了节省开支，每天放学路过斑竹村食堂我都要捡二炭（食堂大灶没烧过的煤炭），那几年家中都没买过煤，烧的全是我捡的二炭。每年寒暑假我们几姊妹都要去割牛草和猪草卖了补贴家里的开支。我们一家虽然经济拮据，但有父亲在家，有妈妈的慈爱教育，我们也不觉得苦了。暑假里，每天晚饭后，父亲都要带我们去龙凤溪的老鲤滩游泳。没钱买救生圈，父亲就将妈妈手工缝的中式裤子，先用水浸湿，然后将两只裤脚用绳子捆紧，一人将两只裤脚高高提起，一人将裤腰用双手尽量撑开，只听父亲喊：“一、二”，两人一起将裤子腰向下猛地罩向水中。裤子顿时就胀鼓鼓地充满了气，父亲赶紧拿出两根绳子，一根将裤腰捆住，一根将先捆好的两只裤脚弯过来捆在一起，就可以套在身上当救生圈用，而且是不用钱的救生圈，不用时，将几根绳子解开，在溪水中将裤子搓洗干净，带回去晾干后就又可以穿了。父亲还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叫“水马儿”。在那几年，父亲在老鲤滩还救过4个溺水的孩子，他们都是西南农学院教职工的子女。不知是孩子回家怕被父母打骂而没跟父母说，还是跟父母说了，父母怕自己被戴上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的帽子而选择了沉默。虽然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现在救一个落水者都是见义勇为，大肆宣传，可父亲在生活极端困难，营养极度不良，患水肿、贫血的情况下，冒死潜入水下去救人，不但没人感谢，还继续受迫害，也没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当然你可以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但父亲是舍命相救呀！这真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了！不过相比后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中的遭遇，那几年我们过得还算顺利平安的了。

### “文革”中被批斗

“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来“抄家”,我们家一贫如洗,他们虽然没拿走什么东西,却将一尊我们几姊妹最喜欢的瓷像砸碎了。理由是:封资修的坏东西。几十年后,我在央视的“去伪存真”节目里才知道,这尊景德镇烧制的王母娘娘满脸慈祥地抱着一筐蟠桃的瓷像,现在已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文革”中的一天,我们几个没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孩子正在村里玩,突然听一个卖菜的农民在说:“哎呀,你们西农的何院长在龙凤溪老鲤滩跳河了。”我们几个孩子立即向龙凤溪跑去,只见何院长躺在河边的草地上,双手紧握,嘴唇紧闭……

####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委员会

关于封昌远同志错划右派改正盟纪处分恢复盟籍的决定  
盟员封昌远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在西农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曾受到我盟开除盟籍的处分。  
在贯彻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中,西农党委(总支或支部)来函称,封昌远同志的右派问题,经过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已撤销原有行政处分,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据此,经我会临时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研究决定,撤销我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给予封昌远同志的开除盟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封昌远同志的盟籍。



地址:重庆市金汤街八十号 电话:三五七二 电报挂号:七二四二

关于封昌远同志错划右派改正盟纪处分恢复盟籍的决定<sup>1</sup>

晚上,父亲回家,面部浮肿,鼻梁上有伤口,周围青紫,衣服上满是血迹。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答

非所问地,自言自语地说:“不知何院长现在怎么样啦。”我们回答:“今天上午在龙凤溪跳河了。”父亲又问了一些情况:如肚子胀大没有?倒水抢救没有?穿衣服没有?等等,然后很难受地说:“何院长水性很好的哟,游泳也游得很好,他没张嘴喝水,是呛水,是他已经安心去以死明志呀!”沉默片刻后又说:“辛亥革命先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宣传家陈天华是在日本蹈海,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同胞。何院长是蹈河,他不是跳河。昨天太阳快落山时,我们还在一起担牛粪,何院长望着快落山的太阳,长叹一声说:‘哎,太阳快落山了,我就跟它一样了。’我当时就担心他熬不过这关,急忙安慰他,并对他讲了姜子牙年轻时受尽磨难,做任何事都不顺,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到80岁还当了宰相的故事,叫他看远点,他还年轻,将来还有转运之时。谁知他今天还是……”父亲的话我们当时听得懵懵懂懂,心中还想着、担心着他脸上和鼻子上的伤。多年以后我们懂了父亲的话,也懂了他的心胸是何其宽广,何其无私。他自己尚且自身难保还冒死安慰别人。结果一起“劳改”的同仁以为告密可以立功受奖让自己早日脱离苦海,并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表示自己已有觉悟,以“借古讽今,妄想翻案”的罪名向革命群众组织揭发了父亲。第二天,父亲在第4教学楼被批斗、毒打,还被人从楼梯上踢下去,摔断了鼻梁骨,摔破了脸。那些人还不罢休,还要将他拉到厕所去灌大粪。当时我们伤心极了,觉得这些手段太残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遭受的折磨还不算最残忍的,这种罪名好多情况下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交送公安机关判死刑。

父亲这辈子从少年时代就经历重庆的“3·31”惨案,经受了血的洗礼,青年时代在北平参加举世闻名的“12·9”运动,抗战时在重庆编辑《现代农民》杂志,为农民朋友排忧解难,还唤起民众的爱国心。这期间他还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日机的疯狂轰炸奔赴成、渝、鄂、西昌等地,指导当地的农业技术改进。解放初期,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红岩村的土地房产毫无保留地捐给了重庆市妇联,为抢救遭受严重虫灾的军粮,他不顾生死日夜操劳,错过了登记民盟的时间,以致几十年后退休待遇大打折扣。(下转第52页)

<sup>1</sup> 图片由作者提供。

#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发展历程

□文/张晓华

在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东麓的歇马镇磨滩河畔,于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近 2000 亩的土地。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在果园、苗圃连成的绿海中错落有致地镶嵌着一排排温室大棚,小溪、流水、竹林点缀其间,令人心旷神怡。这里就是在业界名扬中外的国家级柑桔专业科研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又名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以下简称柑研所)。50 多年来,柑研所先后聚集了几代数百名科技工作者,他们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为祖国的柑桔学科研究和产业发展献出了青春、汗水与智慧。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统一领导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1957 年国家在北京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1958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又在辽宁兴城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随后,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农科院开始酝酿在南方建立柑桔研究所,并有在四川或江西建所的意向。后经 3 次专家考察和论证,最后确定在重庆缙云山农场建所。1960 年 10 月,柑研所在重庆北碚区澄江乡王家坪重庆市缙云山农场成立,曾勉教授任首任所长,重庆市农业水利局局长张若千兼任党委书记、副所长。1961 年 2 月 15 日起,正式启用“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印章。

柑研所挂牌成立后,仍在不断寻找所址,1960—1963 年间历经几次搬迁。1962 年 1 月,所部由重庆

市缙云山农场部迁至北碚区磨滩乡原重庆平板玻璃厂旧址暂驻。1963 年 1 月,所部由平板玻璃厂旧址迁至现址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柑桔村 15 号原北碚钢铁厂厂部(原西南农科所旧址)。



上世纪 60 年代的办公地点<sup>1</sup>

1966 年 5 月,正当柑研所初具规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之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柑研所也未能幸免,所里的科研工作基本中断,部分科技人员被下派到产区蹲点。1971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撤销建制,当年 7 月柑研所人权、物权、财权交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管理。1978 年 8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恢复原建制,柑研所隶属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双重领导,以地方管理为主。1979 年 1 月,柑研所隶属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为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部为主。同年 9 月,柑研所建制改为以部管理为主,恢复地师级单位待遇。

2001 年 9 月,为适应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要

<sup>1</sup> 本文所有图片选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50 年(1960—2010)》一书。

## 校史校情

求,柑研所与原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西南农业大学,实行中国农业科学院与西南农业大学共建、以西南农业大学为主的管理体制,保留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的名称,亦称西南农业大学研究院。2005年7月,在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中,柑研所随西南农业大学并入西南大学,实行中国农业科学院与西南大学共建,以西南大学为主的管理体制,保留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名称对外开展工作,亦称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

### 二

我国是主要柑桔种类和栽培品种的原产地,柑桔栽培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现在我国柑桔产区已遍布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柑桔栽培面积和年产量均跃居世界首位,柑桔已成为我国南方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支柱产业。作为全国柑桔科学研究主要中心,柑研所在推动我国柑桔产业跨越式大发展的征程中可谓功不可没。

建所以来,柑研所以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重点研究柑桔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评价、利用,柑桔优良品种和砧木的引种、选种、杂交育种、辐照育种和基因工程育种,柑桔栽培生理,高产、优质、低成本及精准栽培技术,以病毒病和类似病毒病害为主的柑桔病害调查、鉴定和防治,柑桔重要害虫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及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柑桔果实贮藏、加工及综合利用,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柑桔产业宏观发展与信息研究等,着重解决柑桔生产和科学研究中全局性和关键性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在柑桔加工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方面,柑研所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柑桔果实贮藏技术研发,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2,4-D和多菌灵或托布津洗果处理加薄膜单果包装简易技术迄今仍在我国柑桔产区大面积产业化应用。其柑桔加工产品开发也取得长足进步,柑桔加工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柑研所就利用柑桔胚乳培养获得三倍体植株,80年代后期又开始建立柑桔高效转基因技术体系,目前柑研所研究开发的抗柑桔溃疡病转基因材料已获



无核优质品种——中育7号

得农业部安全评价证书,转基因柑桔新品种的培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抗缺铁”和“食用疫苗型”等转基因良种材料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效。同时针对柑桔生产中出现的的问题,柑研所大力加强开发研究,将科研产品及科技开发业务范围逐渐从种苗、鲜果、农药,扩大到系列保花保果剂、促花剂、保鲜剂、果蜡、加工品以及小型机械设备等。近年来,柑研所又积极开展分子辅助育种,显著地加速了选育种步伐。

为践行“产学研结合,拉动产业化发展”的目标,柑研所加快了信息化进程。他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南方果树》和《中国果业信息》两份全国性科技期刊,其中《中国南方果树》成为中国期刊方阵期刊和国家双效期刊,曾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科技期刊”称号。建立了服务全国柑桔产业的柑桔科技信息网站《芸香谷》(www.cric.cn)和所官方网站《中柑所在线》(www.cric.cn)。其中《中柑所在线》(www.cric.cn)2007-2009年连续3年获全国农业网站百强称号。柑研所还根据全国柑桔生产发展动态,不定期地有针对性地编印各种专题性资料,供生产及科研参考。目前已编印了《柑桔丰产综合栽培技术》专辑、《全国柑桔花芽分化与保花保果学术研讨会专辑》等上百种专题资料。这些资料从选题到选材都紧扣当时全国柑桔生产发展的需求,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同时,他们还在系统开展保花保果、果园水土保持、绿色植保等技术研发基础上,强化精准施肥、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等研究,柑桔信息化和精准化技术跃居国内先进水平。此外,他们还开展信息化远程教育,为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提供便捷的信息服

务。柑研所担负着组织协调全国性重大科研或科技



开展科技义务咨询活动

项目协作的使命。从1962年8月组织召开我国柑桔科技界的第一次柑桔科技工作宏观发展论坛“十年柑桔科学规划座谈会”开始,柑研所多次主持召开全国柑桔科学研究规划会、研讨会、协作会,组织开展了若干全国性科研或科技项目协作工作。进入本世纪以来,柑研所始终坚持每年主持承办至少一次全国性会议或培训班,扩大和加强国内科技力量的协作和合作,得到了行业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柑研所还积极为国家及柑桔产区各级政府宏观决策服务,参与或主持全国和地方柑桔产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论证等工作。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江三峡地区柑桔产业规划,到21世纪初在农业部主持下组织编写全国柑桔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全国柑桔非疫区建设规划、重庆市柑桔非疫区建设规划等,柑研所为国家柑桔优势产业带建设勾画蓝图,为全国优势产区柑桔产业发展编制规划,为全国数十万亩现代柑桔果园进行工程化规划设计。而在柑桔生产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柑研所发挥专业人员多和无教学任务的优势,总是奋斗在产业第一线。2008年柑研所派出50余人次在8个受灾省(区、市)开展抗冻救灾活动,为减少果农受灾损失做出了巨大贡献。

### 三

作为一个以应用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多年来柑研所一直以“推动我国柑桔科学进步,促进我国柑桔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为柑桔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是柑研所历来的传统。建所初期的1961年,柑研所即在所外建立6个科研基

点,以后陆续在广西、湖南、上海、四川、云南、福建等亚热带、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柑桔产区建立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试验站、基地或基点,开展科学实验和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在千千万万的果农中传播良种,推广技术,转化成果,支撑了我国柑桔产业做大做强,展示了他们对我国柑桔业的无限热诚和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从20世纪60年代建所开始,柑研所一直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服务。1979年以来在所内开设为期20天以上的脱产学习专业培训班共100多期,为全国各柑桔产区培养专业技术骨干6000多名。此外,柑研所还经常帮助地方政府在当地定期或不定期培训技术干部或果农,发放技术资料数万份,派出科技特派员(挂职人员),得到科技部的表扬。20世纪80年代初柑研所成立了专门负责科技成果推广及咨询服务的业务部门,开展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人员培训等工作。

近年来,柑研所高度重视与龙头企业的合作,通过新品种和无病毒容器苗推广、优质丰产技术集成和示范、技术培训和科技咨询服务等,先后为北京汇源集团、江西赣南果业、重庆三峡建设集团、重庆恒河果业公司、福建森美公司等国内柑桔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了扎实有效的技术支撑和科技服务。近10年来,柑研所实现开发纯收入400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经济紧张的状况。



国家种质重庆柑桔圃材料保存圃

### 四

半个世纪以来,柑研所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南非、韩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



1995年合作承办第13届国际柑桔病毒组织(IOCV)会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构建了国际柑桔学术交流的宽广平台。

1985年以来,柑研所先后承担了一系列有关柑桔品种资源、品种改良、栽培、植保、贮藏、加工研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特别是“九五”以来,柑研所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全力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多渠道建立合作关系,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自1972年以来,柑研所累计接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友好人士2000多人次来所考察、访问及学术交流。同时,也派出200余人次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习、考察、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或攻读学位,并多次承办或合作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努力推动国际化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 五

继2001年柑研所整建制并入原西南农业大学之后,2005年再度并入西南大学,实行中国农业科学院和西南大学共建体制,以大学管理为主。柑研所充分利用院校共建的新体制及科教资源高度整合的优势,在科技平台、人才队伍及学科建设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初步形成学科和人才队伍比较齐备、装备和实验研究条件日趋完善、创新和产业服务能力不

断加强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重要研发服务机构。

利用共建机制,柑研所获得了植物保护学科博士点,建设了柑桔主要病虫害可持续控制基础研究教育部创新团队,建成了柑桔学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近10年来,柑研所相继建立了国家柑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果树种质(重庆)柑桔圃、农业部柑桔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国家柑桔苗木脱毒中心等10余个科技创新平台。其中,国家果树种质(重庆)柑桔圃是我国最大、世界第三的柑桔基因库,收集保存了来自国内14个省(区、市)及世界13个国家的柑桔种质和品种材料1千多份,涵盖柑桔亚科植物中10属25种14变种,其中不乏野生珍稀资源;国家柑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果树行业首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西南地区农业领域首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国家柑桔苗木脱毒中心保存的421个无病毒良种原种材料已为我国柑桔主产省(市、区)提供了大量无病毒母本材料。另外,柑研所还配建了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实验室和智能化温、网室群,配置了全自动DNA测序仪、基因芯片扫描仪、等离子光谱仪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600多台(套)。这些科技创新平台,为我国柑桔科学事业进步和柑桔产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柑研所紧密依靠西南大学已招收研究生200多人,并申报了不少科研项目。同时,柑研所发挥自身的土地资源优势,为学校提供了500余亩土地用于实习农场建设,充分发挥了相互促进作用。

我们相信,有自身半个世纪积淀下来的深厚根基和文化底蕴,有院校共建体制与科教优势资源的强力支撑,柑研所一定能够建成国际一流的柑桔科技创新中心、柑桔科技产业孵化中心、国际柑桔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为中国和世界柑桔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杨程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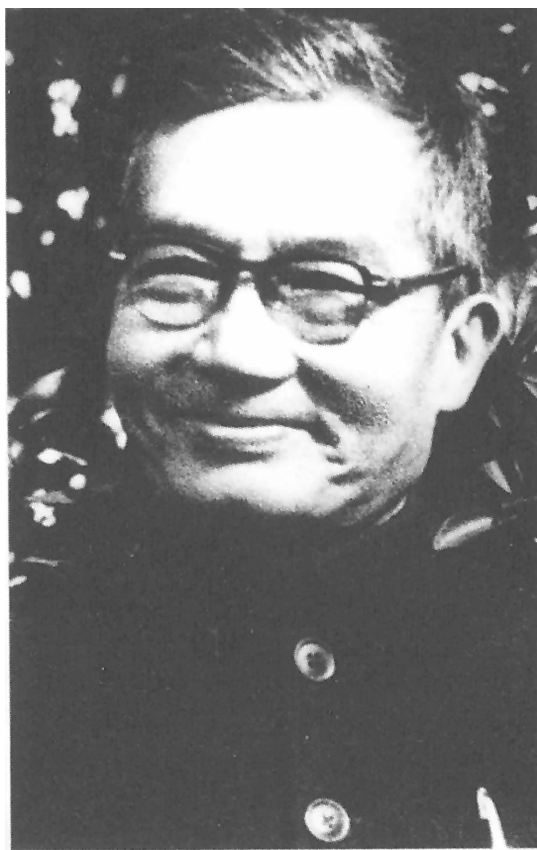
# 与曾勉所长在一起的日子

□文/李兆麟

我原先在公安机关工作,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被定为“极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秋,我被下放到重庆市公安局下放干部的缙云山农场工作。1960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成立后,我暂时住在该农场场部。一天晚饭后,赵银泉场长与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正在寝室聊天。这时,曾勉所长缓缓走进来,我们起立让座,他示意我们坐下。赵场长简要介绍了我们三个人的情况。曾所长听得很认真,临走时还与我们一一握手,并对赵场长说:“他们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要安排适当工作,让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

1961年元旦后,我到缙云山农场歇马分场工作。1963年6月,歇马分场划归柑桔研究所用作试验场。试验场建设面临的首要工作,就是将原来一个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地方改造成柑桔试验生产基地,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根据总体规划,测量、制图、放线、开山放炮、打桩定点、挖填挑运土石方等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我在现场工作,因为负责工程进度,所以有时会列席柑桔研究所所务会或所长办公会。对此,有个别同志反对,认为我根本无资格参加。曾所长听后不以为然,并说:“这是工作需要,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要老是盯着别人的历史问题不放,总要让人做点工作。”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能够说出如此富有人情味的话语,是需要点胆识和雅量的。对此我深受感动,并终生难忘。

建所初期,百事待兴。曾所长对试验场的建设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带领有关领导同志和技术人员到现场检查指导,对柑桔丰产栽培试验



著名园艺学家曾勉<sup>1</sup>

园的选址布局、品种安排、早中晚熟品种搭配、定植株行距、定植穴大小深浅、底肥施用数量等具体问题都认真检查,严格把关。所有柑桔树定植前必须绘好果园平面示意图,报他审批同意后方可定植。血橙园因改土粗放,兼之误将株行距由5米×4米做成了6米×5米而被推倒重来。曾所长说,柑桔树龄较长,我们更应严肃对待,讲究质量。

1966年夏末秋初,“文化大革命”爆发,曾勉所长和两位中层领导周行野、周开隆以及吴德达(场级

<sup>1</sup>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50年(1960-2010)》。

干部)和我,当时在柑桔研究所内被称之为“一曾两周加吴李”,首先受到点名批判。在贴满所部及试验场的第一批大字报中,涉及我们5人的就有300多张。“一曾二周”先后“靠边站”,“吴李”也被停职反省,下放劳动。

随着运动的持续,曾所长一度离开所部,先在试验场曙光队返溪桥附近,从事驱赶秧田间麻雀,拔除果园杂草的工作。后来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曾所长竟和我与另外一位同志一起劳动。我们尊敬他、照顾他,始终叫他曾所长或曾老。他对我们也客气、友好、关心。他知道我们不抽烟,就买点糖果带在身上,休息时常给我们两颗“润润喉”。由于我们都身处逆境,大家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时间一久,环境渐适,大家心态渐趋平和,倒也有说有笑。曾所长很健谈,从去法国留学讲到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从三坟五典、百宋千元、文史哲经、诗词歌赋讲到民国和当代;从自己中年丧妻讲到决心终生不再娶;从自己的优点长处讲到自己的缺点不足,并对自己曾经严重伤害过一位济辈蔬菜园艺学家而深感内疚,对“学习队”<sup>2</sup>的人员也都深表同情。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们也听得认真仔细,受益匪浅。曾老留给我的印象是: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真不愧为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一天下午,我路过位于所内的返溪商店,见曾所长在那里饮酒。他把我叫到身边耳语,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钱伟长将随中国代表团访美。对此,他认为中央可能放宽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因而十分高兴,特来此喝上一杯。我对他说,你历史清楚,又未犯过错误,按理比钱伟长的条件好。他说钱伟长在北京,是大家;我在歇马,是小卒,“天高皇帝远”,很难说。我劝他耐心等待。分手时,他一再打招呼,叮嘱我此事不要告诉第三个人。过了一段时间,曾所长真的离队回到了所部,而我仍在试验场曙光队劳动。

1972年,我重回场部工作。后来听说曾所长身体不适,不能履行所长职务,我感到惊讶和惋惜。1988年1月1日,曾所长病逝,享年87岁。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和惋惜。

逝者逝矣,生者何堪?古云:饮水不忘掘井人。谨以此文表示对曾老等柑桔研究所老一辈建设者们的怀念。

(本文转自《中国果业信息》2010年第10期,稍有修改)

(编辑 刘润)

## 北碚行

□文/申再望

缙云滴翠，  
嘉陵涌碧，  
文星湾里，  
草木葳蕤。  
恩师毕至，  
少长咸集，  
言辞珠玑，  
玉叩心扉。  
长亭古道，  
枫叶正红，  
译海深深，  
秉烛潜行，  
笔耕不辍，  
星汉荧荧。  
往事历历，  
学子莘莘，  
几多坎坷，  
几多艰辛，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泉流九曲，  
泠泠淙淙。  
山花野卉，  
各有其美。  
人生天涯，  
芳草萋萋，  
生生不息，  
不息生生。

<sup>2</sup> 学习队,指“摘帽右派”集中劳动的生产队,编者注。



# 解放前后的相辉学院

## ——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碚和护校漫记

□文/李华模<sup>1</sup>

位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后在原复旦大学旧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私立高等学府,它继承复旦大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陕西省副省长、玉米专家林季周以及为革命牺牲的徐世甫、潘光汉、李树华、孙冰等烈士。相辉学院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光辉永存。

### 在风浪中前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全国学生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斗争此起彼伏。在当时学生运动中,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此前后,一些进步同学组织了近百个社团,如相辉社、艺术剧社、综合剧社、文涟社、正谊社、兰天社、音乐社、三六日报社、工友夜校、体育社团、朝敦社、绥航球队、突兀球队等。办壁报、画报,举办基督徒团契、小型时事座谈会,演话剧、活报剧,唱解放区的歌,跳秧歌舞等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在各社团中涌现出很多追求进步、有才华的学生,如李南浦、杨昌文、陈映男、徐孝坤等,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或民主党派成员。这些社团画的漫画,写的文章都具有很浓的革命性和艺术性,让人看后忍俊不禁,受益匪浅。这时的相辉学院学生在重庆可算是一支很活跃的宣传突击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一周,相辉学院组织了一批同学到重庆大学和重庆商学院参加营火会,还指派了其中一部分同学到南岸重华学院、南林学院等院校去串联、鼓动。重华学院大礼堂内来了一两千人,我记得当时大家还推选我做了演讲。

4月18日,为了将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生存”的运动推向高潮,中共地下党在相辉学院的夏坝球场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火会,邀请重庆一些大中学校的代表共同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4月21日,重庆市发生了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和请愿的运动。重庆市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全市戒严三日,并派出军警特务,处处防范。当天下午,我院宣传队的同学被围困在正阳学院不许出来。被关的同学们在反动军警强力威胁下,不气馁,不惧怕,不妥协。同学们对着铁门外的群众高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高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很多路过的群众都来围观,却被反动军警强行驱散。虽然街上到处都有军警特务窜来窜去,但同学们的斗志仍然非常高昂。到了晚上,电灯的光亮很弱,大家就燃起蜡烛,演话剧、唱“山那边好地方”等革命歌曲、跳秧歌舞等,我还演了“读祭垮台内阁文”。我们的表演引来不少人围观,一些包围学生的军警特务也争先恐后地挤到大铁门前观看。第二天,反动政府强行将我们逼上汽车送回北碚。由于时局紧张,学校虽然没有正式放假,但很多同学已经自行离校了。

5月初的一个晚上,同学高宝宁约我到嘉陵江边散步,互相交谈当前国内形势和相辉学院内的情

<sup>1</sup> 李华模,原相辉学院文史系(文二班)学生,地下党员,离休干部。

况。他突然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青社的负责人，观察我的言行已有一段时间，认为我表现不错，很坚强，愿意介绍我加入民青社，并要我负起领导民青社的责任。他还说：“明天写个便条给你，到勉仁文学院去找李蕙春<sup>2</sup>接头，由她领导你。”我回答说：“我在1947年寒假回达县老家过春节期间就已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但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你说要我负责领导民青社，我可能挑不起这副重担。你为什么把民青社交给我呢？”他答道：“选能嘛。”第二天他确实把字条交给了我，上面写“李蕙春同学，请你接待李华模同学。”我拿着字条有些踌躇，李蕙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会不会找错？考虑到当前形势逼人，不能再迟疑了，第二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鼓着勇气走到勉仁文学院大门的值班室，请门房转请李蕙春，门房说人不在。我只好请他代为转告李蕙春，我明天再来。第二天，我终于见到了李蕙春，把高宝宁对我说的那些话告诉了她，我们互相交换了意见，留下通讯地址后我便走了。从此她就经常来相辉学院与我碰头，研究分析北碚及相辉学院的一些动态。

大约是6月初，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几个同学到北碚黄桷镇一带做社会调查，住宿在相辉学院，我高中同班好友杨奉瑞也在其中。每天傍晚我俩都到嘉陵江边散步谈心，后来我发展他为民青社社员。他回去后建立了组织并发展了一批社员。

“四·二一”运动后，重庆时局很紧张，反动派到处抓人。高宝宁从川南撤了一些同志到相辉学院交给我，我将他们安排到合川“草街子小学”。李蕙春说：“女师附中的唐开秀、戴国芬两位同志身份已暴露，有危险。”要我去将她们撤出来。为避开特务跟踪，我连去了三次，才将她们接到相辉学院女生部住下来。两天后，我用卖衣服的2元钱，买了船票将她们安全转移到她们亲戚家。同时，进步同学徐世甫、胡北淇两人走到北碚车站时，徐世甫被抓，胡北淇幸免。胡北淇回到相辉找到我，我立即在黄桷镇找了船送他回到重庆。相辉学院进步教授王文则也在同一天被捕。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眼见不少社会底层劳动

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上不起学，便萌发了办工农夜校的想法，想尽自己有限的力量帮助他们扫盲和提高他们的觉悟。我先去找校警队的李中舒队长，问他想不想读书和了解一些时事，他说当然想。我又请他征求其他几位校警的意见，他后来答复说他们都想学，这坚定了我办夜校的决心。这期间我专门跑到黄桷镇、东阳镇、大明厂和玻璃厂去宣传，并贴出通知。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相辉工农夜校开学，记得那晚来的人有天府公司驻黄桷镇的一些职工家属，黄桷镇、东阳镇的一些农民，大明厂和玻璃厂的工人，划渡船的船夫，总共上百人。开学典礼会上相辉学院有十几位进步同学演了话剧《不识字、无文化的痛苦》，还唱了“山那边好地方”等革命歌曲。相辉工农夜校创办时，为了使之合法，我去训导处登记，他们不予登记。第二天张教官问我办工人夜校干什么？我说“学文化嘛”，他听后没说什么，哼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7月初，我患痢疾回达县老家医治，在此期间发展肖汉昭、汪英洪为民青社社员。他们在家乡工作开展得很出色。8月中旬我回到相辉学院。

## 护校斗争

9月初学院开学后，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重庆形势十分紧张，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区和单位都成立了“应变会”。此时校方也撒手不管了。高宝宁与我商量，为应付当前时局，也应成立相辉学院“应变会”。于是由高宝宁出面召集各斋的一些同学共同讨论成立“应变会”，并选出甘国舜为“应变会”主席，我为副主席兼福利股长，李南浦为宣传股长，并把选举结果张贴在院里。我因去草街乡看望那里的同志，未出席当天的会议。会后高宝宁对我说“对福利股的保卫、后勤工作你要负实际责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高宝宁、甘国舜时而在，时而不在于，我也就切实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大约1949年11月，川西地下党沙磁北碚区特委刘康同志派来王烈同志为代表，准备与北碚区管

<sup>2</sup> 李蕙春，中共党员，北碚区负责人。

理局局长卢子英谈判和平解放北碚的问题。李蕙春和高宝宁向我介绍了王烈，我随即在相辉学院背后小溪边租了一间农家房屋，作为他的暂住地。据刘康后来回忆说当时组织上已把北碚作为市委后撤的基地。

当时文史系二班的同班同学杨鸿儒因家境贫寒，申请半工半读，学校安排他在印务室工作。我同样也是家贫，我俩常在一起学习、游玩，我需要他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慢慢地我便发展他为民青社社员。每天晚上无人注意时，鸿儒就到印务室将钢版铁笔等带出来，交给女同学郑光宇，再由郑光宇用大衣裹着带到王烈处刻印。中国共产党有关解放战争的战情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解放区的新歌词等就是在这里由我们油印出来的，印出来后我们便在周围散发张贴，有几次我们还到北碚街上散发张贴。

时局的发展真如“山雨欲来蛙鼓乱”，根据估计，解放重庆大约就在十天左右。有消息说北碚管理局与反动的内二警勾结，有一个团的兵力要来驻防，准备做垂死的挣扎。针对这个新动向，王烈、李蕙春、高宝宁和我在一农户家商量对策。王烈通过关系先找到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秘书王文杰牵线，与卢子英谈判和平解放北碚的问题。几次谈判后，卢子英接受了我方的条件，同意和平解放北碚，而且他还表示愿意提供一部分经费为和平解放北碚做准备。

11月27日，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即将进入重庆。当天晚上蒋介石突然下令炸毁工厂，屠杀被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革命同志。当时高宝宁、甘国舜都不在学院，而情势危急，需立即决定应对办法。王烈、李蕙春是外单位人，不便公开出面插手相辉学院的事。在此危急时刻，我马上召集了一个在校师生会，研究如何应对时局。为保护全院安全，决定各斋推选一个人负责管理各斋的安全，派人日夜巡逻，不准陌生人入内；各自积极购买、储备粮食；“一斋有急事，各斋齐上阵，团结一致，共同护校”；晚上不准随便走出学院；密切注意同学中几个反动派走卒的动向，防止他们从中作乱。此决定一出，大家拍手赞成。此时人人都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积极性。

11月30日，我们在尖嘴至寒冰馆马路边、东阳镇路边贴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

毛主席、朱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碚”等革命标语和李南浦的漫画。标语贴出不到半天，就有人报信说国民党的溃兵即将途经黄桷镇经夏坝相辉学院向合川方向逃窜。我们担心刚贴在路边的标语引起国民党溃军不满和报复，只好赶紧动员全体师生员工往相辉学院后山分散躲避，待溃兵向合川方向走后大家才回到宿舍。此时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12月1日，我们接到消息，又有溃兵过来。为了避免学院遭到浩劫，我们只好找人烧了开水摆在大门口，想赶快送走瘟神，不要侵扰师生，就这样溃兵过了一批又一批。下午7点左右，又有一批溃兵走到相辉学院登辉堂和图书馆时停了下来，要强行在登辉堂安营过夜。我们有上百人的师生员工和他们头目交涉，讲这是高等学府，不能借宿，但他们不依不饶、出言不逊，最后他们还是在图书馆过夜，外面派兵执勤守卫。溃兵们的蛮横行为引起了一位叫陈中政的校警的不满，他找我说：“老子不怕他们，今晚我躲在教室后面向图书馆放他三枪，叫他们龟儿子赶快滚。”他的话让我觉得是个隐患。校警只有四只旧步枪，平时白天都不用，只是晚上执勤时用。今晚如果陈中政真的向住在图书馆内的溃军开枪，必将引起他们的报复，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这些校警都是工友夜校的学员，所以我急忙去找校警队的人谈了开枪的利害关系，同时我希望陈中政把他的枪交给我保管，他不同意。我又给校警队队长李中舒做工作，希望他劝说陈中政把枪交出来。李中舒与我是同乡，我们平时也很接近，经过他做陈的工作，最终陈同意将枪交给我保管。晚上，我们安排两名校警在教授院和女生院门口巡逻，另外两名校警在登辉堂至尖嘴巡逻，就这样护卫着我们学院的安全。第二天早晨，国民党溃军离开相辉学院。师生们都很高兴，瘟神终于走了，心里也平静了。

## 迎接解放

1949年12月2日，这是北碚最不平凡的日子。上午九、十点钟左右，北碚管理局卢子英局长的秘书打电话到相辉学院收发室找我，电话里说卢局长交代当天下午大概五、六点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



北碚学生欢迎解放军进驻北碚<sup>3</sup>

到达北碚,希望我组织相辉学院师生到天生桥欢迎。接完电话,我急忙找到几个民青社社员和各斋斋长开了个会,决定发动女同学用前天已经买好的红布和彩色纸制作旗子,男同学做旗杆,并写了三幅“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碚!”的横幅标语,一幅挂在学院大门上方,另外两幅分别挂在北碚至相辉的街口和民众会堂上方。大家认为应画一幅毛泽东主席的像,我请贺熙尧同学到禅岩西南美专去请廖其澄来画主席像。他和女朋友洪珉一同来的,我们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毛主席,相片也没有,正在着急时,有一位同学拿出半截画报,上面有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下飞机时戴着博士帽子的照片,廖其澄便照着这张照片来画,画像速写出来后人家都笑了,说:“到底是不是毛主席啊?”有人说,画报上登的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名字,错不了。

我打电话找杨奉瑞同学,请他组织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师生到歇马场路边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只好作罢。我来到相辉学院校门外的江边找到工友夜校学员——船工黎某,在他的帮助下租了8条渡船以便过江前往天生桥。下午3点钟我吹哨召集各斋人员到操场集合,后

即去教授院请老师们一同过江。相辉工友夜校横幅在前开路,相辉学院横幅紧随其后,全院师生员工约1200余人,兴奋地挥动着手中的小旗,高呼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碚”等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向天生桥走去。队伍快到天生桥时便停下来等待解放军到来,等了很长时间解放军都未来,我和几个同学便到附近借来几条凳子,请方敬、张默生、徐德庵、高亨、王文彬、游志崑、宁澈澄、刘觉民等老师坐下。一直到下午六、七点左右,才见一辆卡车开来,上面载着20几个解放军,后面跟着四五十个步行的解放军战士,双方都高兴地挥手欢呼,高喊口号。解放军队伍步伐很快,部队没有停留,听前面首长说他们要马上过江追歼向合川方向逃窜的国民党败兵。我立即领着几位同学带部队去坐我们租来的那8条船,迅速渡江。待部队过江后我们才回到学院,此时已是晚上10点了,大家赶紧烧火煮饭。虽然感到有点累,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终于迎来了亲人,天真的亮了!

数日后的一天上午有两个解放军到校来找我过江去开会。我们一同来到兼善公寓二楼会议室,见到有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天府煤炭公司、大明厂、农民、商界代表各一人,加上我共有6人。解放军同志先讲话,大意是:请各位来是要组织一个北碚区各界人民代表领导小组,并请各单位派出几个代表,明天上午在民众会堂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碚大会,现在请你们6位自行推选一个组长。我推选重庆教育界著名人士张博和校长为组长。张校长推辞,说还是高等学府代表为组长较好,其余4人也一致同意推选我为组长。第二天北碚各界人民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会在民众会堂召开。到会的各界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分列就座,北碚欢迎小组成员6人和解放军首长座在主席台上。会议开始后我代表北碚各界人民热烈欢迎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进驻北碚,后由12军政治部主任李坚同志代表解放军指战员讲话,主要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军队,是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命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能保障北碚人民安居乐业,正常生产、生

<sup>3</sup> 图片来源: [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html/2009-11/09/content\\_1015810.htm](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html/2009-11/09/content_1015810.htm)。



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与北碚各界人士上街迎接解放军<sup>4</sup>

活的人民军队，希望大家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谣言等。我与肖军长靠近坐，会间肖军长问我：“你是哪里人呀？”我说是达县盘石乡人，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红军曾经在那里的曾家山打过仗。”我说：“知道，曾家山就在离我家只有20多华里的洋烈乡、东临河乡对面。当时我年纪虽小，但已懂一些事了。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刘湘结合的边防军打曾家山时，童团长、杨团长率两团人夹攻红军。当时雾大，打仗

时只听到炮的响声，打得很激烈，晚上还见国民党抬着很多伤兵从家门口走过。后来听大人们说，仗打到太阳出来雾散后，才知道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遍山尸首。红军趁雾从童、杨两团包围圈中早已悄悄突围撤出，往宣汉县方向去了。结果从两边夹攻的国民党军还在互相打。”肖军长听后笑了起来，我问肖军长“您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吗？”他说：“是。”这次欢迎大会，重庆的报纸还做了报道。

从这天起北碚人民得到了彻底解放。这次组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碚和护校工作是在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重庆市委，川东、川西特委、北碚区委的领导下，发动全院师生员工积极奋斗，同心协力才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由好几支党的外围组织及民主党派师生们密切配合、共同奋斗取得的。

12月底，有的同学继续升学学习，有的同学由组织分配走上新的战线，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发挥自己的才华。

流光易逝，迄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当时相辉学院的各种运动我都参加了，但每当回忆起当年全院师生员工在护校斗争中不畏艰险、团结一心，共度危难的精神时总是心生敬佩，也为自己能够参与其中而感到欣慰。

#### 后记：

这段往事是根据作者的回忆断断续续所写，因作者年事已高，所以难免有疏漏。请相辉学院的师生员工们看后给予指正，同时也希望老师与同学都可对那段岁月写出自己的活动、看法，认识和感受。各个人的回忆汇入到一起，可起到互相参考、删补的作用，形成一段完整的历史记录。

(编辑 张晓华)

<sup>4</sup> 图片来源：[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html/2009-11/09/content\\_1015810.htm](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html/2009-11/09/content_1015810.htm)。

# 办公大楼遭围起了

□文/杜缙华

前些时办公大楼开始维修，在QQ群里看到一群友拍的“办公大楼遭围起了”的照片，突然勾起了一件往事，心中感慨颇多，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准确地说，勾起记忆的还不是照片本身，而是图片标注的“办公大楼遭围起了”。这里说的是办公大楼因维修工程安全用挡板围住了，是好事；我想起的却是办公大楼被人围住的一件往事，是一件算不得好事的往事。

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大约是在1966年，也就是那场人皆尽知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校园里的红卫兵响应最高统帅“炮打司令部”号召，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黑党委”，轰轰烈烈地开展大字报、大辩论运动。校园里铺天盖地全是大字报，造反派们今天揭发这个，明天批斗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其它大、中、小学也“停课闹革命”了。我那时还是附小4年级学生，还不懂事，看见所谓“外调”的造反派成天到家中对自己一向敬畏的父亲拍桌子打巴掌、吆来喝去逼迫“交待问题”，小小的人儿心中的那份害怕、忧虑不言而喻。由于没学上了，又因是“黑五类子女”也当不成红小兵，我便成天在校园里到处乱转，提心吊胆地偷偷地看大字报，生怕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到底还是出现了不少）。

言归正传。有一天我正在校园内东张西望，突然看到身边一群红卫兵匆匆忙忙跑过，像是发生了什



被围起的办公大楼

么大事。我本能地跟着跑去，刚跑到樟树林就听到办公大楼方向人声鼎沸，仗着人小腿快，我很快跑到了办公大楼后面的图书馆（现在的东方红会议厅），踮起脚抬头向对面看去，只见红卫兵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办公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身着旧军装、头戴军帽、腰系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地对众人喊道：“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得到可靠情报，西师（西南师范学院的简称）的黑党委正准备把整学生的黑材料转移出去，妄想秋后算帐，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众红卫兵群情激愤，挥臂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交出黑材料才是唯一出路！”等等口号。可能楼里面堵得紧，红卫兵们虽然吼得凶，却也冲不进去。总之，交出什么“黑材料”是不可能的事，红卫兵们也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肚子开始咕咕作

响,准备回家吃午饭了。正待转身离去,却突然听到一阵吼声:“让开!让开!烫到了活该!”循声望去,只见一群食堂的大师傅抬着一些热气腾腾的东西威风凛凛地走来!大师傅们抬的抬、挑的挑,还有一个端着一大笊箕的碗、筷子、汤勺等,原来食堂的大师傅们是给被围困在楼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送饭来了!细细一看,只见大木桶里盛的是白米饭,大铝盆里装的是红烧肉、炒莲花白,还有个师傅挑了一担不知是什么汤,反正浮在上面的油水足足、葱花青青,啊呀呀,在那个啥子都要凭票的年代,这可是一餐美餐哦!只见当年西师食堂鼎鼎有名的高级厨师徐胖子手挥大勺一马当先走在送饭队伍前面,放开嗓门理直气壮地说:“革命要搞,饭也要吃噻!”那时的工人阶级可是钦定的领导阶级,谁也不

敢和他们作对。革命小将们只好让开路,眼睁睁地看着送饭队伍雄赳赳、气昂昂、畅通无阻地开进了办公大楼,自己还只能饿肚子,想来也一定郁闷极了。我想这下子里面的人吃饱了肚子自然还可以支撑一下午,我也害怕回家晚了要挨打,便赶快回家吃饭去了。至于此事后来是如何收场的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本人如今也是“奔六”的人了,就是除掉当知青的4年,也在西师呆了有50余年,前前后后经过的、看见的、听到的人和事也不算少了,但不知为啥当年的情景却深深印在了脑海里。别的议论不敢乱发,但想来那时的干群关系必是极好的,否则“办公大楼被围住了”一定会让工人们幸灾乐祸、拍手称快,更休想还有大师傅们突破重围、主动送饭上门了。

后记一:好多年后,我到云南招生,刚好同行的领导就是当年被围困在办公大楼里的干部之一,谈及此事他还记忆犹新。他说:“学生不懂事啊,办公大楼里的材料早就转移出去了,还能等到他们来抢嗦?”唉,可怜当年不懂事的红卫兵小将们啊!

后记二:一小学同学的母亲就是当年办公大楼里管理档案的干部,同学看此文后好奇地回家问母亲,才晓得当年转移出的档案其实就藏在第一教学楼旁边的夹皮沟(现已填埋后成了第三运动场)里一个原生物系废弃的保管室内,与他们的红卫兵大本营近在咫尺。

后记三:一儿时朋友看了此文后,感慨道:“当年妈说父亲被围在办公大楼了,叫我做饭去送,后来又听说有人送饭了就没去。现在才知道是这么回事,真是感谢那些食堂的师傅们!”

(编辑 杨程程)

(上接第6页)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从没上过大学,却在世界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著名世界史专家郭守田教授在唁函中赞誉孙培良:“对学术贡献甚多,对伊朗古代历史、特别是艺术史,造诣极深,为我国学术界争了光,在国际上为吾人争得地位!”

#### 参考文献:

[1]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孙培良的人事档案。孙培良《干部档案》正本,编号SW0608-009,内中是孙培良先生个人在各个时

期所填写的表格、履历、个人历史自述以及其它有关调查资料等文档。文中凡采自档案材料者,不再出注。

- [2] 杨群章. 苦寒一树梅自香——记孙培良教授[C]. 《缙云山下一支歌》编委会. 缙云山下一支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32-39.
- [3]. 比较中西历史 弘扬中华文明——孙培良论著读后感[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09:64-70.

(编辑 张晓华)

# 西师岁月随想录

□文/李玉光

四十年前的今天,在众人的羡慕的目光中,我离开自己视为第二故乡、赋予我坚强意志的那片热土——凉山,离开我曾十分热爱并为之奋斗的工作单位——凉山共大,满怀喜悦和希望迈进了我朝思暮想的学府——西南师范学院,成为那个时代最幸运的人。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实践锻炼中。四年时间转瞬即逝,但对西南师范学院<sup>1</sup>(以下简称西师)的美好回忆伴我一生,学习、生活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点点滴滴、轶闻趣事时常浮现眼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 坚持就是胜利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重庆大学生游泳通讯赛”女子50米蛙泳和100米仰泳两个项目。在100米仰泳离终点还有20米时,我因用力过猛,小腿意外抽筋,越动越抽,越动越痛,越痛越慌,最后右腿竟完全无法动弹,身体仅能依靠双手和左腿轻微活动浮在水面。是坚持?有很大的难度。是放弃?我有点不甘心。这时几年前发生过的一幕浮现眼前,激励我坚持下来。那是在凉山插队的时候,一天我背着准备给知青造房烧瓦用的木柴,拖着踝关节红肿疼痛的右腿,从山下往山上一步步挪动。钻心的疼痛使我几次差点扔掉木柴,但我强忍着巨痛坚持了下来,一路汗水、泪水相伴,最终到了山顶。事后检查得知我右腿踝关节已经脱臼,但我竟然背负160斤木柴上了大山!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艰难的?于是我咬牙坚持、再坚持,最终不仅抵达泳池终点,而且两个项目都进了前六名,获得

了奖励。具体名次我记不清了,但那段经历刻骨铭心。坚持就是胜利!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铸就了我们这代人永生不渝的性格。

## 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在我的相册里,还珍藏着一张我和几位同学和部队战士一起擦炮弹的照片,那是1975年重庆日报记者拍摄的我们在重庆南岸某炮兵连学军的情景,让我们时常又回到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训岁月。



学军时的照片(最左边者为李玉光)<sup>2</sup>

当时我们听说要到部队进行军训而且要荷枪实弹练习的消息,想到我们就要到部队,而且要操弄那神秘的大炮,别提有多么激动。但到部队后,紧张的训练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令人腰酸背痛的队列训练,不择天气和地形的摸爬滚打,紧张的射击打

<sup>1</sup> 19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

<sup>2</sup> 本文图片由尹明祥老师提供。



靶,枯燥的反复拼刺……这一幕幕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夜间那一声声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唤起了我们多少兴奋、紧张、有趣、感动的回忆。

那时夜间常有紧急集合。按照规定,一听到哨响,沉睡的我们必须迅速起床,在无灯的情况下打好背包,飞快地跑出列队。夜间紧急集合不仅要计时,公布最后入列人员,而且还要检查打背包的质量。如果谁的背包在教官的手中抖散了,就要当众亮相出丑,因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潜心苦练摸黑打背包的技术。记得当时校团委的一位女书记与我们同住一屋,她本是老师,自尊心又很强,由于不知紧急集合何时到来,为保万无一失,她便每天晚上提前把打背包用的绳子理好放在身边随时准备着,结果她整个军训期间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奋勇争先的认真劲和天真做法感染了我们许多人。

还记得军训中的一天深夜,学员们早已睡熟,但我还在偷偷收听“Radio Peking”,刺耳的紧急集合哨声突然响起。我马上翻身起床,迅速打好背包,拿起枪一个箭步冲到操场。当听到教官报“第一名”和所用时间时,尽管偶然成分大,但我仍兴奋至极,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免自鸣得意。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的射击测评中,同年级的女生陈金玉第一名,我第二名。军训使我们在吃苦、勤奋和守纪等方面经受了锻炼,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基础。如今回想起来,趣闻谈笑间,那火红年代年轻学子们纯真向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真是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线。

## 永存的记忆,永怀的感恩

四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但西师确实是让我们梦绕情牵、终身难忘的梦里故乡。当年系领导和其他教职员面对学习程度参差不齐的我们,没有怨言,没有放弃,想尽一切办法,披星戴月、满腔热情地帮助



西师女子排球队合影(第二排左二为李玉光)

我们。正是历经他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中的大多数才有可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骨干,有的还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记得徐宗英老师对我每周额外写就的作文都要一一详批细改,毕业时还赠与我很多珍贵的书籍;江家骏老师给我推荐读本并亲自在其中疑难处一一加注。甚至在我毕业后,两位恩师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予我指导,为我寄来教辅参考资料,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在从教路上少走了弯路。还有我们女子排球队的教练陈老师,长期带病训练,并发动小孩及身为男排教练的丈夫来一起陪训,尤其是在我生病手术后,竟亲自熬汤照顾我,让我感激涕零,至今深感无以为报……当时这样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以他们为代表的老师们始终无私地付出。他们朴素、真挚而醇厚的师恩,我当永生不忘。

记得在西师50周年校庆时,外语系挂出了一幅“欢迎回家”的标语,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让我们倍感亲切。是的,西师曾经是我们的家,存储着我们一代人最火红的青春记忆,承载着我们一代人最深沉的精神家园。我们应该常回家看看,因为纵然树高千尺也离不了根,我们纵然云游四海也忘不了本。

(编辑 张晓华)

# 刘达耕诗歌选

□文/刘达耕

## 沁园春·母校西师

林木荫荫,锦绣花园,学府天堂。  
借缙云山势,增添妩媚;嘉陵江浪,灌注芬芳。  
学海无涯,书山有路,海阔天空任翱翔。  
少年梦,趁东风浩荡,书写辉煌。

桃、梅、李、杏<sup>1</sup>名扬,竞争道诗情画意长。  
忆蝉鸣清露,莺歌拂晓;黄昏日落,风送晚凉。  
秋月春花,冬云夏雨,岁月流金分外香。  
抬眼望,又秋高气爽,无限风光。

## 沁园春·园丁颂

金秋十月,花甲学生,母校重游。  
忆峥嵘岁月,青春焕发;凌云壮志,热血奔流。  
博学师长,少年志士,知识海洋情意稠。  
恩师训,启人生真谛,指引航舟。

韶华不忍回眸,承师德讲台话语柔。  
看满园春色,桃李天下;花香鸟语,情系故丘。  
烛影人生,舌耕日夜,斑白两鬓无所求。  
园丁颂,喜殷殷学子,续写春秋。

## 同学会书怀

—  
同窗岁月几春秋,嘉陵缙云山水幽。  
人世沧桑风雨后,夕阳依旧照山丘。  
二  
人生有幸再聚首,追忆韶华叹白头。  
狮子峰前景依旧,举杯共醉缙云秋。

## 重回母校<sup>2</sup>

重阳佳节喜相逢,回首当年幻影空。  
母校情深常入梦,校风师训伴秋冬。

## 烛影人生

三尺讲台粉笔灰,烛光燃尽彩云飞。  
舌耕自有苦中乐,一颗童心伴落晖。

## 梅花

芳心高洁知春早,雪雨风霜枝更俏。  
一树凌寒独占先,敢将花蕾冲天笑。

<sup>1</sup> 桃、梅、李、杏指学生宿舍桃园、梅园、李园、杏园。

<sup>2</sup> 这是一首藏头诗。

# 悉心求索 学而有成(下)

——记西南大学校友申再望

□文/点点

## 对口译的研究心得

申再望通过多年的口译工作实践,对口译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心得体会。这里引述申再望的一份教案中的几点心得体会:

1.翻译工作分为文字和口头两类。礼宾工作中口译的比重相对较大。口译要求反应快,转换语言能力强,不容译员花时间斟酌字句。因此译员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不能有片刻分神。还要求译员记忆力好,人家讲的话,你听一遍就能记住,进行复述。还要求译员理解力强,人家讲的话,你能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口译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2.就中国译员而言,笔译工作汉翻英难,口译工作英翻汉难。笔译是翻译工作的基础。我国翻译专家说过,有平时翻译的基础,才能练出口译所需的快速反应和熟练的语言转换能力。由于年轻人脑子反应快,外交部通常让年轻人做口译。笔译需要深思熟虑,斟酌字句,就让上年纪的人作笔译。

3.翻译要注意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关心国际时事,每天读报,看电视,不断掌握新的词汇,新的表达法。比如说到台湾,中国的官方表述决不会说 China and Taiwan,而是说 The mainland and Taiwan。台湾参加 APEC 会议,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参加 APEC 会议的国家 and 地区时,不能把地区漏掉,不能说参加国 countries,而要说会员 members。翻译对此要有一种职业警觉性。

4.翻译要重视对母语的掌握。对于中文的表达,要下功夫学习。比如汉语中的成语,典故,诗词,古文很难翻译。如果自己的汉语基础浅薄,自己都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如何翻译给外宾?大家可能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国宴厅讲话,结尾引用毛泽东诗词“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事先没有读过诗词,就可能译不出来。幸好当时举国上下都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诗词,对这些诗句耳熟能详。不少外国人在访华讲话中都喜欢引用中国典故,所以翻译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申再望<sup>1</sup>

随着口译能力的增强,申再望开始尝试在工作中做同声翻译。2007年在成都举办的西博会国际旅游文化推介会上,申再望为来自菲律宾的华侨和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中文演讲作了英语同声翻译。挪

<sup>1</sup>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威和英国专家到四川省和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验收脑瘫儿童扶助基金项目，申再望也作了同声翻译。2012年，加拿大使馆驻华参赞麦道伟访问华西医院，申再望为医院领导讲话作同声翻译，随行的加方资深翻译刘先生赞扬说，申老师你真了不起，能做汉译英同声翻译。

随着年龄渐老，申再望感到记忆力开始衰退，有些单词会一时想不起来，可是只要工作需要，他仍挑战自我，作现场口译。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特派官员路易斯·瑞塔拜会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申再望做了主翻。

同年，四川省副省长黄彦蓉会见各国出席国际旅游推介会的嘉宾，申再望也做了主翻，那年他已63岁。中国对外友协领导曾感叹说，老申上了这个年纪还能口译，在我们友协很难有人做到。

### 勤奋笔译写作，终有收获

申再望自参加外事工作始，就开始了笔译和中文写作。他笔译的作品大多来自他接待的外宾。1981年，他接待了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这名记者在成都、卧龙拍摄了一组关于川菜、农村、熊猫保护地的图片，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出版的大型画册《漫游中国》选用了这些图片，记者高兴地给申再望寄来一本。画册的第八章是宋雪丽撰写的“旅游四川”，申再望觉得文章写得很幽默，便一气呵成将之译为中文，冠名《蜀国行》，发表在《编译参考》。

韩素音访问成都《分忧》杂志后，为杂志社写了两篇随笔，一篇是《美国妇女为权力平等的斗争》，另一篇关于西方青年的精神颓废，申再望将之译出，该杂志分两次刊登。

申再望尝试翻译的第一篇美国文学作品，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咸荣向他推荐的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毕业》，这是厄普代克的处女作。申再望将译文寄给施咸荣以后，施教授作了细致的修改，并将修改稿寄回给申再望，要申再看一看。申再望对“俄狄浦斯情结”这个词的翻译修改提出异议，施咸荣再次回信，说明这个词不仅有恋母情结的含义，也包含恋父情结的意思。这篇译文刊登在《美国文学研究》上。施教授把刊物寄给申再望，鼓励他翻译更多

的文学作品。

因工作要求，申再望开始编辑画册。1991年，申再望主编了《四川》画册并撰写了序言。1992年，他主编了大型画册《西南丝绸之路》。这本画册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曾在香港国际书展展出，并被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迄今仍为国内外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

后来申再望的翻译作品扩展到影视领域，四川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先后请他翻译电视专题纪录片《神秘的三星堆》《大熊猫探秘》《大理好风光》等。有的纪录片还请他录制英语解说。申再望通过对影视片英文字幕的研究，发现影视片的英文台词不能原文照译，而要尽量简化，长句变短句，否则观众来不及看完字幕画面就过去了。这一研究结果对他翻译影视片颇有帮助。

申再望在香港工作期间，持续写作关于香港的散文随笔。散文《清风满袖 潇洒人生》，抒写了香港政界领袖范徐丽泰的爱国情怀，这篇文章获得第二届全国妇女期刊好作品二等奖。

从香港回来后，申再望出访工作渐多。他开始通过散文随笔，记叙异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1999年至2001年，申再望访问以色列、智利、巴西、阿根廷的5篇散文随笔陆续在北京《当代世界》发表。其中随笔《探访基督的足迹》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少见的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正面探讨；《哭墙行》叙述了犹太民族两千年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对耶路撒冷真实历史的追索；《暮色中的阿连德》则重提阿连德之死疑案，解析了阿连德执政失败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这些基于史实、见解独立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兴趣。

申再望对于诗歌有特别的爱好。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四川大学西南高校教师进修班学习期间，曾主修诗歌。主课教师卡琳福德是剑桥大学硕士生，他在授课中喜欢朗诵英文诗歌名篇，给申再望许多熏陶。申再望读了很多中外诗集，获益甚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泰戈尔的《飞鸟集》，惠特曼的《草叶集》，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以及聂鲁达的《聂鲁达诗选》是他最喜爱的外国诗作。

申再望的第一本译作是以色列女诗人巴·谢娃的作品《古老的人民》。《古老的人民》是一本设计独

到、印制精美的书，书里收入了巴·谢娃与以色列总理拉宾等人的通信以及大量的历史照片，是珍贵的以色列文学档案。这本诗集曾参加过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受到好评，也曾得到出席斯洛文尼亚国际笔会的各国作家的喜爱和赞赏，被誉为“超出想象”。巴谢娃的诗作是希伯来文，由一位著名的以色列教授译成英文。申再望感觉英译文比较浅白，缺乏诗歌的音律和韵味，便花了许多心思来翻译，尽可能发挥中文词汇量丰富、含义深邃细腻的优点，力求把诗歌译得更美一些。初稿完成后，申再望寄给英国老朋友秦乃瑞审定。秦乃瑞是著名汉学家，爱丁堡大学教授，中国文坛名人陈西滢、女作家凌叔华的女婿，中英文造诣很深，他修改了申再望译文的几处小错，并在来信中夸奖说：“译得不错，在有些地方，中文的翻译比英文还好。”申再望为这本书写了长篇散文《雅歌与罡风》，记叙了自己与巴·谢娃的交往以及翻译这本书的经过，表达了对犹太民族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犹太文明的景仰。

申再望还翻译了巴·谢娃的另一部诗集《雕鹗的荒野》。这本诗集收入巴·谢娃访问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和兴文竹海的诗、献给巴金的诗，还有她于2003年在成都举办的第7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朗诵献诗以及与巴金胞弟、资深编辑李济生的合影。巴·谢娃托申再望把《雕鹗的荒野》中文版寄给巴金的女儿、上海文学期刊《收获》主编李小林，李小林又把书转给了李济生。李济生读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新民晚报》发表回忆文章《珍贵的异国友情》，文中两次提到“申再望翻译的图文并茂的诗集”，并引用了申再望的译诗《有时会发生》。李济生还两次给申再望来信，赞扬申再望“不愧为外事工作者”、“功不可没也”。2007年，李济生的文章连同申再望的译诗和译文（巴·谢娃致李济生的信）收入《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

2008年，申再望翻译了巴·谢娃第三部诗集《时光的瞬间》。该诗集除了巴·谢娃的诗，还收入了申再望与巴·谢娃、李济生、海逸达等人的通信，以及申再望的长篇回忆散文《月光倾情 记巴·谢娃访问四川》。申再望再次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写作散文，记叙了他陪同巴·谢娃访问四川、到绵阳市出席国际李白文化节以及访问成都的情况。这是巴·谢娃第三

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四川，她回国后就患了重病，在临终前她还写了一首怀念中国友人的诗，让她的丈夫寄给申再望。

2008年的北京奥运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和振奋。浙江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图书《奥运奖牌上的中国文化》，请申再望担任英文译者。这部大型图书以精美的图片和考究的文字，展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和金石文化，学术水准很高，翻译难度甚大。仅就“玉璧”一词的翻译，申再望就查阅了中外多种英文书籍，还为此请教了美国、英国的专家学者。这本书的出版，为北京奥运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尤其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很快销售一空。

同年，申再望的涉外散文随笔集《生命之树长青》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凝聚了申再望的前半生心血，共73篇文章，20余万字。中科院院士刘应明曾问他为什么取这个书名，申再望回答说，书名来自歌德名句“朋友啊，理论是暗淡的，生活之树长青。”马克思曾对燕妮说，他最喜爱这句诗。在英文中，“life”既有生活又有生命的意思，加之书中有一篇凭吊马克思墓的同名散文，就取了此名。

申再望曾出访六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仅美国就访问11次之多，每到一地，他都是白天奔波，夜晚挑灯做详细笔记。他有一个心愿，把他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奉献给读者，可惜工作太多，没时间整理旅行札记，这个愿望迄今没能完全实现。

## 演讲和开设课程

申再望在成都学界的名气，部分来自他在多所院校的演讲。他曾应邀在四川大学、成都大学等院校发表题为《四川与印度》《中泰友谊源远流长，民心所向》《追寻红色足迹》《西方文化系列讲座—圣经文化》的演讲。申再望连续四年培训了中国西部博览会的成都高校志愿者一千多人，并被四川行政学院、阿坝师范专科学校聘为客座教授。

《西方文化系列讲座》是申再望计划开设的一个学术性的文化讲座，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文

化开讲,到希腊罗马文化、英国文化,再到法国文化、意大利文化等。《圣经文化》是第一讲,申再望将多年来积累的对希伯来文化和犹太历史的学习研究加以提炼总结,形成了一个内容独特、内涵丰富的演讲,深受学生好评。演讲前,申再望为了消除一些人对在学校演讲圣经文化的疑虑,特意请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帮助查阅了马恩全集,准确引述了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的经典论述:“在早期基督教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当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sup>2</sup>听讲的教师和学生表示,这是第一次获知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基督教有如此积极的评价。也由此可见申再望对历史研究和学术演讲的严谨态度。

2006年,申再望应邀在成都体育学院外语系开设“外事知识和国际礼仪”课程,为北京奥运会培养体育运动英语专业人才,这项课程计算学分。为了不影工作,申再望每周两晚骑自行车或搭乘公交车到学校授课,持续了几个月。申再望很早就预见到随着中国人出国机会增多,数量增大,对于出国文明礼貌的培养教育需继续加强。他在课程里特别增加了出国礼仪章节,从入住酒店、会见和会谈、用餐和宴请、参观、拍照、衣着、礼节礼貌等方面系统介绍了出国的礼仪。申再望对出国礼仪的讲解,在高校开了一个好头,让学生们获益匪浅。

自2011年起,申再望先后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巴中市巴州区、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成都邛崃市、都江堰市等地,为1000多位中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作了题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国际化》的演讲,并对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思路、途径和评估标准提出了积极建议。

2012年,申再望应成都市文化馆邀请,作了题为《外国人眼中的成都》专题演讲,将他熟识的外国名人、作家、诗人、教师、艺术家等在成都的生活经历和文学作品娓娓道来,用外国人的描绘和感受,揭示

了成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外国人的深刻影响。

申再望作为四川省休闲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曾多次参加全国和四川省的休闲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他在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作了题为《休闲与外交》的发言,受到专家们好评。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不妨把建设城市的休闲区、休闲带,提升城市的休闲功能和休闲文化作为目标,可能更切合城市的发展脉理和最终解决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

## 书写红色回忆

进入新世纪以来,申再望与众不同的家世和个人经历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不少媒体向他约稿,要他讲述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以及自己在动乱年代的亲历,这成为申再望写作的又一题材领域。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作品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影响。关于这类题材,申再望最早的作品是《风雨潇潇,往事历历,回忆母亲肖里》,这部长篇回忆,记述了肖里在动乱年代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经过。这篇回忆录在成都的几家报纸连载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共鸣,被称为“催人泪下的伤痕文学”,不少人希望回忆录能够出书,可是由于题材敏感的原因,书至今没能出版。

2001年是陈毅元帅诞辰100周年,申再望受命撰写纪念陈毅元帅百年诞辰诗歌朗诵音乐会演出台本。他再次细读了陈毅诗集,选出代表陈毅元帅光辉一生的数十篇诗歌,以包含深情的文字加以串接,挑选相关歌曲,使整个台本大气恢宏,感人肺腑。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和家人出席观看了在成都的诗歌朗诵音乐会,对纪念演出给予充分肯定。

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申再望在香港《文汇报》发表回忆文章《我在邓伯伯家过新年》,记叙他和妹妹在1972年新年之际到南昌探望邓小平一家人的经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在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段往事,并说这是

<sup>2</sup>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申再望与傅高义教授在哈佛塑像前合影

他们家迁到南昌以后,第一批登门探望的小客人。邓小平听了申再望和他妹妹讲述母亲肖里的不幸遭遇,十分难过,亲自下厨为申再望和他妹妹炒菜做饭。2007年,这篇文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发表,当即被全国各家网站转载。美国学者傅高义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具有历史价值,读后令人感慨。

应香港《文汇报》约稿,申再望写作了另一篇回忆文章《亲历香港回归》,记叙在港接待邓朴方的经过。其实香港回归大典刚结束,香港《文汇报》就约过申再望写稿,但当时新华社有内部纪律,不能对当地传媒透露接待细节。因此过了好几年,申再望才动笔写了文章。由于是独家新闻,被新闻界认为很有价值。直到2008年,深圳一家报纸还转载申再望这篇文章。

2009年,邓小平夫人卓琳去世,申再望写作了《怀念卓琳》一文,深情回忆了卓琳与自己母亲肖里从延安开始的友谊,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的不朽贡献,以及晚辈们的崇敬之情和无尽思念。这篇文章在《成都日报》、上海《新民晚报》、中国新闻网等报刊网站发表或转载。

同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申再望应约为上海《新民晚报》军事栏目组撰写回忆文章《青山无言,我的父亲李井泉》,披露了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支援京沪和全国而调出大批粮食的真相,还原了李井泉顾全大局、执行中央决定,并忍辱负重、勇于承担责任的历史事实。这篇文章在《新民晚

报》发表,并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我的父辈,开国元勋、开国元帅、开国功臣后代深情回忆》。申再望还应斯里兰卡友人约稿,用英文写作了《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的文章,介绍了李井泉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浴血生涯,这篇文章发表在斯里兰卡的政治刊物上。

2011年,党中央决定举办座谈会纪念李井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李井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申再望任该书副主编。纪念文集收入了毛泽东署名赠送给李井泉的《马列主义五大名著》的题字和书的照片,这本具有历史

价值的精装书由李井泉交给申再望保存至今。纪念文集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

2012年,申再望的养母申国藩去世,享年101岁。这位老红军1926年参加革命,有86年党龄。申再望写作了长篇回忆文章《百岁老人申国藩的革命人生》,在《成都日报》发表。同年,申再望应约写作了《挥师南下战旗红》的文章,记叙了李井泉在西柏坡会议期间接受毛泽东的当面部署,与贺龙率军南下解放成都的战斗历程。这篇文章被收入《山西南下纪念文集》。

2013年,申再望应美国中文版《世界英才》杂志约稿,写作了《李井泉挥师战敌顽》的长篇文章,回顾了李井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自17岁参加南昌起义始,历经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率军南下解放四川的卓越功勋。

申再望的红色记忆中包含了太多的往事,他曾在中南海、北戴河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曾当面聆听周恩来、邓小平的教诲,曾随同贺龙视察西昌、攀枝花的三线建设,还与彭真、陈毅、乌兰夫、罗瑞卿等人的子女有过交往。这些故事,有一天他会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申再望是一个低调而谦逊的人,也是一个简朴的人。他认为自己只是大时代的一个普通人、亲历者、幸存者,所做的事微不足道。

(编辑 杨程程)

# 下放劳动

□文/张晓华

**编者按：**1958年5月，教育战线出现了以勤工俭学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运动。同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决定高等农林院校下放劳动一至二年。农业部也决定从1958年下半年起，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同时，四川省高教局党组下发了《关于我省两所农学院师生下放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西南农学院积极响应上级指示，在1958至1959年间，师生以满腔的热情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进行教育改革。下面这组照片就是对当时师生下放劳动生活的最好诠释。



师生排队申请下放农村参加劳动锻炼(1958年)<sup>1</sup>

从1958年9月开始，西南农学院积极进行师生下放农村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10月9日，学院领导向全院师生员工作了关于下放的动员报告。12月，全院师生2521人组成重庆大队、宜宾大队、内江大队、达县大队、南充大队、留校大队6个大队，正式到达下放地区的农村进行劳动锻炼。



内江大队途经宜宾，地委书记前来驻地看望(1959年)<sup>2</sup>

<sup>1</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56页。

<sup>2</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59页。



师生下放初期,以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为主,首先是参加农业生产,过好劳动关、生活关、群众关。他们都争干重活,甚至生病的师生也带病坚持劳动。



共同劳动,搞好生产<sup>4</sup>



达县大队农四三班同学给元宝人民公社修“土火车”轨道(1959年)<sup>3</sup>



达县大队农经系师生帮助公社管理区建立生产管理责任制(1959年)<sup>5</sup>

<sup>3,5</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57页。

<sup>4</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

## 影像记忆

学院刚下放时没有进行教学工作,后来才开展了一些教学活动。教学以现场教学为主,实际是以生产为中心进行教学,强调课程结合生产,能者为师,因此课堂理论教学时间被大大缩减。



现场教学<sup>6</sup>



宜宾大队在油菜地里现场教学<sup>7</sup>



师生深入田间和社员一起总结小麦丰收经验(1959年)<sup>8</sup>

<sup>6</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sup>7</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56页。

<sup>8</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28页。

师生还利用劳动之余,协助公社搞好食堂管理,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同时组织社员成立宣传队、技术组,积极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社员的生活。



南充大队下放师生积极排练,自编春节文娱节目(1958年底)<sup>9</sup>



宜宾大队下放师生排练节目<sup>10</sup>

达县大队演出的五人快板“红苕多样化”<sup>11</sup>

宜宾大队下放师生参加南溪冬季运动会(1958年)<sup>12</sup>



<sup>9,10,12</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58页。

<sup>11</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

下放劳动锻炼期间,师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了解他们的劳动,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研究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既当好参谋,又向社员学习,与社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内江大队农三三班学生,用他们自己设计的开箱器,和社员一道平整新式秧田(1959年)<sup>13</sup>



下放师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甘共苦<sup>14</sup>



栗四娘为下放学生吕宗仁补衣服<sup>15</sup>



临别时社员赠送给师生的一部分礼品<sup>16</sup>

1959年,学院开始纠正过去一些偏激的做法,不仅对下放农村的学生采取半农半读形式安排教学,还分期分批将下放在农村的各年级学生调回学院,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校内生产劳动。师生下放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虽然削弱了基础理论课和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影响了课堂系统知识的学习,但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了工农感情,养成了劳动习惯,掌握了劳动技能,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科研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编辑 郭兰)

<sup>13</sup> 图片来源: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原西南农业大学卷,第28页。

<sup>14-16</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

# 袁隆平的三个“差一点”

□文/邓力

自古以来，一道有关天下粮仓的命题横亘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的面前，世界因缺粮食而焦灼、脆弱、惶恐不安。

但他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他，就是袁隆平。

1982年初秋，袁隆平出现在国际水稻会议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将他引上主席台并介绍给世界各国的专家，称赞他：“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此时，他的头像和一行醒目的英文字幕同时出现在会场的投影幕上：

Yuan Longping—Father of Hybrid R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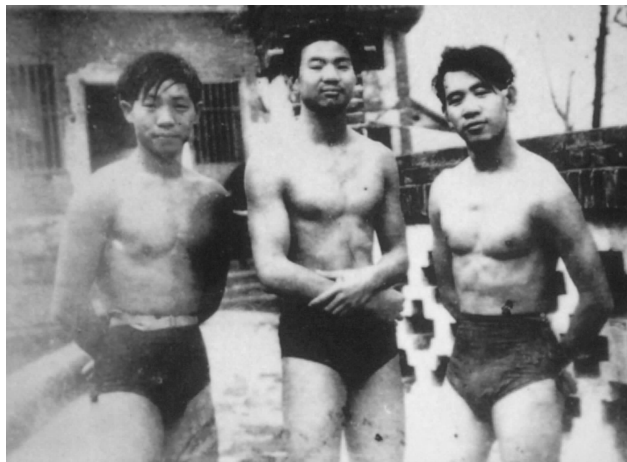
美国前总统顾问帕尔伯格教授称赞袁隆平：“他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在中国，解除饥饿威胁的农民则用朴实而生动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说：“在中国，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二靠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

培育出杂交水稻、解决了整个人类吃饭问题的袁隆平起步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当人们梳理袁隆平的大学生活时，惊讶地发现，要是没有青年袁隆平的三个“差一点”，如此优秀的校友、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又怎会出现！

先说第一个“差一点”。

1949年夏天，袁隆平中学毕业了，面临高考的选择，父亲期盼儿子报考南京中山大学，以后去政府机关谋个一官半职。袁隆平却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了远在西南的私立相辉学院的农学专业。1950年，私立相辉学院农艺系及其专修科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华西大学的农学专业合并组建西南农学院，袁隆平也由此转入西南农学院园艺系学习。袁隆平后



袁隆平(左一)与同学游泳后合影(1951年)<sup>1</sup>

来坦陈，当年选择学农，完全是因为对农村的理想化的理解，因为袁隆平曾经随老师去汉口郊外的私人园艺场参观，以为园艺场的景象就是农村的景象，这“农村”的景象又正好同他看过的电影《摩登时代》中主人翁幻想的幸福生活重叠，他感觉农村真美，于是萌生了学农的理想，最后成了西南农学院的学生。袁隆平出生在北京，成长在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偶尔的一次下乡体验去的却不是真正的农村而是私人园艺场。那个遍布中国大地的真实的又苦又穷又脏的农村，袁隆平没有看到，他说“如果那时老师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去看看，真实的农村是又苦又穷又脏，那我肯定不会学农了。”选择了学农的袁隆平，在后来与农村、农民、农业的长期交往中才逐渐体会到，“虽然农业科技工作苦，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帮助在那里，所以乐在其中”。他也因此寄语今天农专业的学生：“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逐步引导年轻人，改变学农没有出息的错误观念。”

然后说第二个“差一点”。

<sup>1</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SX1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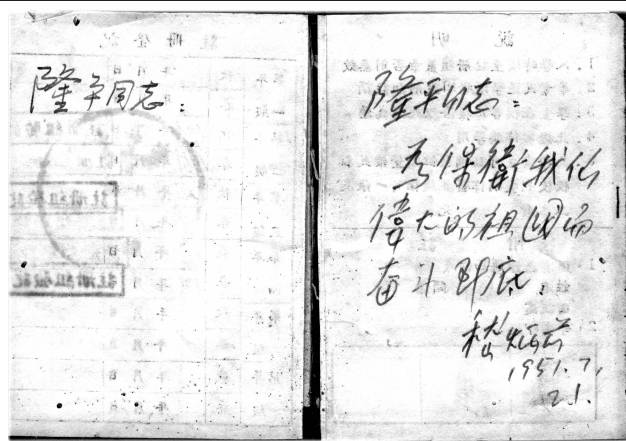
## 西大掌故

袁隆平多才多艺,拉琴、唱歌、跳舞、打牌,啥都行,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游泳。读小学的时候,父亲不让他到嘉陵江游泳,怕不安全,可他就是不听,总是背着父亲悄悄下河去游个痛快。在私立相辉学院读大学时,学校坐落在北碚对岸的夏坝,同学们要买啥东西,得坐船过嘉陵江到北碚城里来。自幼熟识水性的袁隆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他过嘉陵江,不用坐船,而是将衣服、鞋子脱了顶在头上,从江中游过去。拥有游泳的好本领也给袁隆平带来了不少光环,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川东片区游泳比赛,勇夺第一。之后,他又在专业选手如云的西南区运动会上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那次运动会,承担着为国家队选拔优秀运动员的任务,前三名就可以进国家队,名列第四的袁隆平差那么一点点,就被选送到国家队了。

再说第三个“差一点”。

在袁隆平的学生证上有这样一段留言:“隆平同志,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到底!嵇炳前。”

留言者嵇炳前,是志愿军抗美援朝报告团团长。1951年7月,嵇炳前回国为大学生作报告,受到大学生的崇拜。袁隆平受到了嵇炳前在学生证上留言的特殊礼遇。在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保家卫国是很光荣的事,袁隆平也曾梦想奔赴战场,抗美援朝。1953年,即将大学毕业的袁隆平,碰上了解放军



嵇炳前在袁隆平学生证上的留言<sup>2</sup>

到西南农学院选拔飞行员的好机遇。袁隆平毅然决然报了名,同800多名同学一道接受祖国的挑选,身强体壮的他成为8名合格者之一。袁隆平与同学们的分别留念像都照了,第二天就要去空军学校接受正式训练了,却突然接到通知:由于朝鲜前线局势有所缓和,空军飞行员改从高中生中招收,从当时十分稀缺的大学生中招收的飞行员“一律退回”。又是一个差一点!

三个“差一点”,让西南大学人庆幸,有了袁隆平这样优秀的校友;让中国人庆幸,没有成为国家队的游泳运动员或空军飞行员的袁隆平,却让中国多了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奇迹。

<sup>2</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YLP-SW1111-1.0001。

(上接第24页)此事被当年一起奋斗的现在已是全国知名人士的同仁们得知后,纷纷打抱不平,为他写证明材料等。可此事还是因故没能落实。从解放初到1958年以前,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他经常感慨说现在才是搞事业的好时机啊!可是就在父亲的教学科研正处在出成果的关键时刻,他被打为“右派”,被剥夺了

一切权利,下放农村。但他没有沮丧、没有沉沦,在农村凭他的实力、他的真情,获得人们的爱戴和殊荣。文革前后在一切考验人格和灵魂的时候,他都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救别人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这些大风大浪中,父亲都犹如闲庭信步般地走过来了。如今父亲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后记:

以上这些事,充分说明我父亲一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人以诚相待,天真得像孩童,善良得不知如何保护自己,没有防人之心,只知坦诚待人,一切都是先替他人着想的人。父亲晚年曾说过:“我就是只记人好,不记人过,一辈子问心无愧,才能活到今天。”其实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许多受害者都是很单纯、很善良、真性情的人。他们不谙世事,不会阿谀奉承,敢说真话实话却又非常善良,不会拉帮结派以达到个人目的,他们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专业、业务上,本来是单位领导的得力助手,社会的中流砥柱,却因小人谗言而遭受不幸,当然这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编辑 郭兰)

# 校史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文/张艾利

校史作为一个学校的成长记忆,既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又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以其真实性、可靠性、直观性的特点和丰富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力形式和载体。通过对校史资源的开发,使广大师生了解学校发展的轨迹、优秀文化传统、校风、校情和校训;感受学校发展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继承大学文化精神内涵,从而激发他们的爱校热情,增加校园的凝聚力。因此,校史的研究和完善对于当前的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一、校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校史简言之就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源传统、精神动力、文化积淀。主要包括学校的历史沿革、历任校长、办学理念、重大活动、杰出校友、师生事迹、校风校训等诸方面。校史文化就是校史的文化表征,是校史传承的文化链条,是学校在办学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就存在形态而言,包括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精神形态,这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一致的。

校园文化“是以社会先进文化为指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由校园中所有成员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学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sup>1</sup>校园文化和校史文化是高校校园中并存的两种文化现象,校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发展的核心,没有了校史文化,校园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失去自身的

特色,反过来校园文化建设丰富着校史文化的内涵。

### 1、校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的表述中,西方学者利用“冰山模型”来诠释文化分层理论,即把文化分为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例如典型的行为方式或者文化产品等;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sup>2</sup>这种理论说明了在文化层次结构中,位于文化最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价值观。利用“冰山模型”理论来诠释校园文化,可知处于校园文化最核心层次的是校园文化价值观,即“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势”<sup>3</sup>,而校史文化作为校史的重要体现,记载着学校的文化传统、治学精神、价值理念,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文化契约,是对他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评判的价值标准,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因此,校史文化长期积淀的大学精神底蕴、文化生活、校园群体观点和信念等体现着校园文化的精神内容,决定着校园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也决定了校史文化在学校师生员工的内心世界是否被接纳和认同。可见,校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价值观标准,是校园文化内涵中的校园精神文化方面的集中体现。

### 2、校园文化建设丰富着校史文化的内涵

校园文化的内涵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校园物质文化是指学校内物质范围的文化层,它涵盖教学、科研、生活、环境、设施等方面的物质构件,是校园文化的物质基础<sup>4</sup>。具有感染作用、激化作用、导向作用、舒心作用。比如,校园内充满文化底蕴的建筑设施、人文景观、校园艺术形态等,构成

<sup>1</sup> 刘德宇.高校校园文化发展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9。

<sup>2</sup> 李曼丽.“文化分层”理论在大学文化研究中的应用[J].江苏高教,2006(5)。

<sup>3</sup> 蒋家平.论现代大学的价值观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1(2)。

<sup>4</sup> 刘德宇.高校校园文化发展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204。。

高校校史教育的生动题材。这样校史就成为高校校园物质文化活动的有效载体,达到校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校园物质文化高度统一,构建成为一种高尚的境界和良好的氛围,让置身其中的大学生感触物质文化的同时,得到精神文化的熏陶和启迪。而校园精神文化,则反映了一所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想、信念、情操、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平,以及逐步形成的文化传统、治学风格和管理特色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校园文化形态,是学校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是师生员工所认可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校史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大学精神、道德价值观、人文关怀等则是校园精神文化的反映和归结。各高校在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校园文化现象,如各种社团活动的展开、爱国教育活动的举办、科技月的创设、文体体育活动等体现出学校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内涵。这些多样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为校史文化增添了丰富多彩、更加鲜活的内容。

## 二、校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校史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校园文化是以社会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由校园中所有成员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学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sup>5</sup>。而校史记载了一个学校的全部发展历程,不仅记载了高校各个发展阶段的教学场所、教学和教研设备、工作和生活设施,如学校建筑、教学实验设备和办公设施等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提供的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还承载了高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价值规范体系,如学校所积淀的校园传统、办学理念、思想信仰、价值倾向、精神产品、道德水平等精神文化资源。校史所提炼出来的校园文化精神即价值观,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各环节和各方面。校史所记载的校园环境、校园成员的行为、校园组织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校园精神文化。

2、校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作用。底蕴深厚的校园文化离不开大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而大

学精神是一个学校从建立到发展长期积淀下来的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校史研究能够传承和发扬高校优良传统、培养师生高尚情操和品格、发扬高校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同时,通过校史校情教育的开展,有目的地把优秀校园文化传播给大学生,培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优良的大学精神文化,还可以有效地继承学校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延续和创新校园文化。

3、校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凝聚作用。校史不仅积淀了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而且记载了一批批优秀的莘莘学子,他们毕业后奔向四面八方,坚守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被载入校史册,做成宣传材料置于学校的醒目位置,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在校大学生。这对进行爱校教育、增强学校的凝聚力,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将被载入北师大校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使分布在四面八方的毕业生莫不以莫言为傲,无不以北师大为豪,认同感、凝聚力油然而生。

## 三、校史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1、建立校史馆进行校史编研工作,提升校园文化内涵

校史馆是一个学校收藏、研究、陈列和开展教育活动的场所,同时又是积淀和创造大学文化的摇篮,为集中表现校园文化提供舞台。校史馆的建立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传承大学精神的重要基地。校史馆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宣传学校的发展历史,辉煌成就,更重要的是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好的校史馆与校史的编纂工作分不开。校史编纂是校史馆的灵魂,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学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和积淀的过程,而且还保存了一个学校所从事的教学、科研与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片、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因此,要建立好校史馆一是要成立一个专门

<sup>5</sup> 冯刚,柯进文.高校校园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2-4。



从事校史编撰工作的科研团队,对学校的档案进行爬梳整理,编纂成册,及时记录学校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及师生感人事迹。二是校史馆建筑要能体现一个学校的文化特色,彰显文化氛围。三是校史馆建设要纳入到学校的整体建设中去,加强管理,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在机构、人员、经费上要落实,为校史馆的完善打下基础。四是要培育一批专门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如收集历年来重要活动照片、科研成果、学科建设、先进事迹材料、学术活动等各种荣誉证书,借助于这些生动的史料及实物能让大学生得到更直观的了解和鞭策。通过建立校史馆及校史编研工作的开展,呈现大学精神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蕴含的校风、校情、校训等,也进一步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内涵。

## 2、举办各类校史专题展览,增强校园文化直观性

校史是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每一个学校校史都是一部爱国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人物史。近年来,很多高校借助校庆之际,举办校史专题展向学生宣传本校发展的辉煌轨迹和历史沧桑,主要包括社会各界的关注、重大校园活动、杰出校友的学术贡献和社会业绩等方面。把本校中的办学传统、学科建设、大师风采、历史名人、办学精神、校友事迹、校风校训等做成展板展示出来,每一幅展板后面是一个个生动的感人故事,成为学校特有的校史校情教育活教材,是校园文化活动的生动写照。另外,为了更好地丰富校史专题展,还可以让学生跟踪采访当今工作在不同岗位,取得杰出成绩的校友事迹,登在校报或专辑出刊成册,作为校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让学生直接面对面接触杰出校友,和他们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趣事和求学经历,激发他们的斗志和爱校情感,这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最直观的校园文化体现。

## 3、开设校史文化课丰富校园文化内容

通过对学校档案资料的整理、研究、归纳和分析,提炼出大学精神文化,而大学文化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的导向,如何把大学精神传输给大学生,校史文化课程的开展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开设校史文化课,把校史校情教育纳入德育课程,以史育人。校史校情教育的展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校史教育应结合学校的专业特征。在高校中不同专业的学生对校史文化教育的内容具有取舍性和选择性,比如新闻专业的学生对校史中的工科类的内容不感兴趣,缺少专业敏感性。而建筑专业的学生,则对校史中关于设计、造型、绘画等方面记载表现出专业好感。因此在给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校史时,就可加入本校校史中所记载的不同学科的发展过程,包括学科建设、科研成就、教学名师、在本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校友,这样就会增加学生对本门课程的了解,增加学习兴趣,从而更加热爱本专业。

(2)把校史教育融入思政教育课程中。一所高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办学传统、精神文化、具有较高的传承和弘扬价值,彰显了校园文化的丰富性和特色。通过校史文化教育,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把其中积极优秀的文化内核传授给大学生,使其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道德标准和强烈的归属感。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校史文化教育过程中应该结合各高校的两课教学,尤其是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把本校校史文化教育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内容。如教研室的老师可以把校史的相关内容作为学生的实践作业,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到老校区实地考察,对老校友实地采访,对校园各个角落进行拍摄,对各专业的建设过程进行资料搜索,对名人风采进行荟萃等,尤其对学校的办学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这样不仅给他们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认同,还可让他们更加热爱学校,热爱学习,热爱本专业。这样既丰富了校园文化,又对大学生进行了思想教育,取得显著效果。

(3)培养从事校史教育教学的专职教师。要把校史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进行建设,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建立校史教育长效机制,必须培养专职教师,把校史教育系统化、专业化、课程化、常规化,并纳入新生入学的必修课。通过校史教育教学,以丰富校园文化人文底蕴。在讲授过程中,可以采取专题的形式每周一次,如学校的发展沿革、校友风采录、学校大事记、学校历届领导人办学

思想、走进名师大家等。还可围绕校史上的重大事件、管理制度、办学思想、尚有争议的事件设立课题研究,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把学校的历史沧桑、厚重的人文历史、光辉的校园文化以生动风趣的方式讲述出来,阐发其中的所蕴含的重要哲理,这样师生们必然会被校史的生动性以及厚重的人文历史魅力所吸引,从而引起良好的强烈反响。因此,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校史理论知识,有效地授课方法,充满魅力的语言特色,进而打造“名师”的形象。

(4)邀请本校的老教授及杰出校友现身讲授校史专题。教师的职能是培养学生、教育学生,在人类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继承和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并成为大学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所学校的老教授、知名专家本身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而且深受本校大学精神的熏陶,他们的言谈举止带有深刻的文化精神烙印,在长期的授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本校的热爱和眷顾之情。让他们讲授校史课程,可以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和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以及和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的重大事件,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和关怀、学科发展取得的成就、本人在学校中做出的贡献、学校建筑变迁、学校发生的感人故事等的讲述,使学生产生感性认知,从而更加热爱本校。另外,杰出校友的现身讲述校史更易在学生中产生共鸣,如在讲述校史过程中,回顾当年在校的学习经历、生

活趣事、恋爱过程等切身感受及大学学习过程为他们的成功提供的坚实基础,既表达了他们对母校的爱恋又鼓励了学生们的爱校之情并激发了他们的学习斗志,通过校史教育大大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 4、加强校史校情教育,凝聚校园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核和最高表现形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价值规范体系,是学校教育的无形资源,对广大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的成长,逐渐积淀为一个学校厚重的文化基石和文化历史。当精神文化形成后,就可以独立地在校园传播、继承和发展,成为学校独特的精神特征<sup>6</sup>。而校史校情一方面体现了学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即良好的校风、学风、文风及广大师生的治学精神和先进的教育理念等校园精神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这也是校园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将这种富有浓厚文化底蕴的校园文化纳入校史校情教育,可以有意识、有目的、积极主动地对其传授认知,使大学生在认同接受的基础上传承、弘扬、光大,进而巩固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延续和创新校园文化<sup>7</sup>。可见,加强大学生校史校情教育,是凝聚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本文选自《安顺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请作者与本刊联系。)

<sup>6</sup> 冯刚,柯进文.高校校园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7。

<sup>7</sup> 孙永玉.高校德育的宝贵资源和生动教材[J].中国高教研究,2006(2)。

(上接第20页)他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几十年,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砖、一片瓦、一间房产,更没有留下一分钱,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恰逢家父诞辰100周年,我们来到缙云山麓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洁白的鲜花,奉上这篇质朴的文章,寄托我们的哀思。

#### 参考资料:

[1] 朱世祺.我的综合检查交代(文革期间手稿)。

[2] 朱世祺.关于我参加各种组织社团的材料交代(手稿)。

[3] 朱世祺.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思想小结(手稿)。

[4] 朱世祺.我的反省(手稿)。

(以上参考资料均为文化革命结束后,父亲问题得以平反,学校退还本人的原始材料,这是那段历史的记载,资料弥足珍贵。)

(编辑 刘润)